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6月30日第71期

## 本期目录

### 热点研究

李海文 有关江青的两则史实

张光渝 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周恩来——读《吴法宪回忆录》随感

张 从 从校刊《新北大》看北大文革

### 生逢乱世

陈彬生 一个军校学员的文革回忆

### 冤狱残片

徐小棣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以史料为准的修订版）

### 忆旧思亲

蔡天一 无尽的思念——为文革中罹难的父母

陈宗周 一曲挽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李自茂 迟到的追思——悼姜于正

罗成胜 半个世纪的思念

### 书海泛舟

陈秉安 记录者的印迹——《大逃港》作者答客问

---

### 【热点研究】

## 有关江青的两则史实

李海文

江青讲没讲过她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阎长贵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尊重的学长，我们认识七八年，多次交谈，坦诚

相见。他借给我维特克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翻译，2005年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书，我们在一起讨论过。但是我看了他的专著《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中的一文《质疑江青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第311—321页，红旗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后，对他的文章中的“质疑”产生质疑，不得不写此文与阎长贵学长商榷。

阎长贵学长在文章的第一部份引用了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张颖的文章之后说：“就是在张颖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应该指出，张颖等这种说法传播和流布很广，几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都信以为真，传来传去，简直成为不刊之论了。”（见312页）随后他在文章第二部份引用了维特克的书中若干段话后，做出结论：“不难看出，维特克和张颖等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无疑，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第315页）非常奇怪的是，阎长贵又说：“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第314页）。“似乎”与“确实”是两个相反意义的词，在描述一个事物时，不可两个同用。

正如阎长贵学长所说“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所以我也要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阎长贵引用了张颖的文章之后，又引用了一个名叫苦多所著的《江青评传》。他认为苦多是抄张颖的文章，“并加上他自己的演绎和编造”（第313页）。苦多不是当事人，阎长贵做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阎长贵却没有引用当时在场的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阎长贵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而被捕入狱，由杨银禄接任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只担任江青秘书一年的时间，而杨银禄任职五年。所以杨银禄参加了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出版了杨银禄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在第188—189页写道：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江青还说：“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被消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杨银禄的回忆与张颖回忆是一致的。张颖在书中写道：江青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一书，第312页）

一般来讲，研究历史不采用孤证。可以采用两个人的回忆，以互相印证。阎长贵对当事人张颖（与杨银禄的说法相同）的回忆提出了质疑。他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维特克在1977年由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的话，然后说：“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在会见维特克时所谈西北战场

的情况。”我从阎长贵处借到《江青同志》一书，看后发现，阎长贵的引用并不全面。因为这本书看到的人很少。所以我必须也要引用维特克的原文以让读者看到书的全貌。

因为周恩来、毛泽东的反对，维特克没有得到中方的记录。维特克懂中文，当时也做了笔记。她写的《江青同志》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写的。到底江青讲没有讲过她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呢？

维特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她（江青）参考了中央委员会逐日的从陕北到北京征途中的大事记，并装在文件夹里，整天带在身边。作为补充资料的还有手绘的地图和详列战役、军队数量和各战场概况的表格。……她对此反复考虑多年，但还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持续不断地发表看法的机会。外国人必须明白，只有我们（领导同志）才清楚这段历史，只有我们才能全面地描述在全国发生的一切。”（见 194 页）“房间里有两张大桌子，上面放着 6 张地图”（195 页），这些地图不仅有西北战场的，还有全国战局的。“江青说到第三次革命战争期间，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个人的‘我’，转而使用集体的‘我们’。……对江青来说集体的‘我们’主要限于对解放战争的叙述。”（198 页）“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 207 页）

我们再看阎长贵书中引用维特克的话。“她（指江青）和主席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时，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中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到一个驴棚里。”（第 206 页）江青的话前后矛盾。阎长贵只注意到并强调这句话，因而推论江青不可能讲她和毛主席指挥了西北战场。

但是，在维特克书中这几段话的前后，还有这样几句话：

“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 207 页）

“我说这些，不只是写书的需要，你的到来以及出现在我面前已经激发我把这段军事史告诉全世界。”维特克记录的这段话让江青回忆西北战场的目的昭然若揭。一个基层的协理员怎么有资格全面介绍西北战场？！

“她无意中听到一些同志说主席留在这个被围攻的根据地太危险了。她向主席传达了他们的焦虑，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通过以上三个人的描写，江青确实向维特克讲了“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即便在维特克的笔下，江青没有敢用“我与毛主席”，但是她用的是“我们”。这就将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列为中央领

导人，所以江青的讲话才引起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张颖极大的反感。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认为江青谈话内容不实，如“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争”。江青说：“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

“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45、217、23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江青和维特克在广州的谈话，由参加接待的张颖等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到北京后，由江青定稿，一本一本印成铅字。整理工作还在进行，江青迫不及待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看。她心中有鬼，不敢给毛泽东主席看，是想得到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张、姚不敢得罪她，划了圈，没有表态。周恩来认真地看了，在与事实不符之处做了些补充，做了批示。并且亲自听取张颖的汇报，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和内容。然后，周恩来才做出记录稿不能给维特克的决定，并打电话劝阻江青。1972年岁末，周总理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同上，第319页）

如果周恩来认为江青讲的都符合事实，是不会阻拦将记录给维特克的。周恩来是阻止江青不成才向毛泽东报告的。周恩来这样做冒了很大风险。江青生性阴险狠毒，惯于进谗，当时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江青为了表示与众不同，开会时坐在周恩来旁边。另一方面，她时常为难周恩来。有时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议题，江青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要求讨论。江青以毛泽东代表自居，代表毛主席的话时常挂在嘴边。大家都知道，直到1974年夏，毛泽东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江青“她只代表她，她不代表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4页）另外，周恩来知道江青报复心是十分强的。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后，在“帮助”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的调门最高，上纲上线最高。

周恩来见自己阻止不成，就向毛泽东报告。因为，只有毛泽东能管得住江青。毛泽东是一个不受别人摆布的人，要是江青没有讲出格的话，他绝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有没有“约法三章”？

在《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书中，阎长贵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根本”二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当时共产国际派师哲回延安参加七大后回莫斯科汇报。师哲这样讲

的：

1940年我(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回国之初决定我还要回共产国际汇报,康生、江青有意识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以澄清事实,希望我到国际给他们讲讲好话。

中央党校的党员知道江青经常到主席那,集体写信给党中央,坚决反对主席和江青结婚。中央党校的党员集体写了两次信,要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我记得王世英参加了签名。从白区来的同志知道江青的底细,她的几次婚变登在报纸上。大家坚决反对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文革中,王世英受到迫害与此有关。当时上海市委也来过信反对。张闻天在西方生活过,不愿管私人事情。党校学员派代表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他转达。张闻天不得已将口气和缓的一封信转给主席。主席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事情闹僵了,朱总司令出来圆场。他找了一个办法,说:不要反对结婚,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第一,不准江青干政;第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第三,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主席接受了。对于“约法三章”,江青也不否认,也同我谈过。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宴请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李海文《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载《湘潮》2014年第7期)

毛泽东、江青当时是遵守了约法三章的。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离开了中央党校特别班,并没有进入党的机关工作,而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工作人员,除江青还有杨松的夫人杜晴。笔者1978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与杜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听杜晴多次谈到江青的情况。这个单位事情不多,江青主要照顾毛泽东与孩子的生活。那时,江青全心全意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风时,毛泽东将江青送到中央党校,交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彭真安排她在普通班内学习,审查她的党籍。江青老老实实,不敢胡来。七大后被审查的干部都做了结论,她也做了结论,恢复了组织生活。

在延安,江青一直不敢以毛泽东的夫人自居。当时,邓颖超和周恩来、康克清和朱德、刘英和张闻天、蔡畅与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看戏,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而只有江青不敢、不能做到这点。她看戏只能坐在后面,形单影只——这不正是“约法三章”的作用?

不过,这也就成了江青仇恨老一辈革命者,文革中残酷地迫害他们,像疯狗一样地到处咬人的原因之一。

## 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周恩来 ——读《吴法宪回忆录》随感

张光渝

风传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是“超级泥瓦匠”，认为周恩来原则性不强，谁上台他跟谁。而周恩来自己也承认对路线方面的问题不敏感，但遵守组织纪律，对敌斗争坚决。无论这些说法是否确有其事，却能够反映周恩来的基本政治特征——没有个人野心，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对同志（包括与自己尖锐对立的人）仁至义尽，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这些品质从反方面解读，就成了无原则、和稀泥、老好人甚至“虚伪”、“投机”等等。

把周恩来放到中共历史中观察，他无疑是党内斗争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中共党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客观上需要一种延续、维系、调和、回旋的力量，以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传承，于是，周恩来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成为在党中央核心位置上五十年不倒唯一一人的原因。

这一点，决不是自己想要做到就能做到的，这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那段特别的历史阶段，周恩来的这种独特作用再次显露了出来。

在当年延安整风的大背景下，刘少奇是正确路线代表，而周恩来则至少是错误路线主要执行者之一，这一点决定了周恩来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助手和具体执行者的位置上，多年坚定不移，体现了难得的清醒和自律。周恩来对刘少奇是绝对尊重的，但当毛泽东决定要换掉刘少奇，重用林彪时，周恩来又无条件地像尊重刘少奇一样地尊重林彪。必须把这种态度放到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宁都会议、遵义会议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考查，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同样，邓小平之所以敢在文革初期对林彪大不敬，敢在文革后期与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公开唱反调，也要回溯到江西根据地“邓毛谢古集团”中找原因：那时候，周是王明博古派而邓是“毛派”。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发表了实际上是炮打张春桥的讲话，吴法宪等人要求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周恩来是同意的。按照吴法宪回忆录中的说法，周恩来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我们找不到不经毛泽东批准就能改变议程加放两遍林彪讲话录音的理由。

当风头逆转，陈伯达被批，吴法宪被追究的时候，周恩来于8月28日单独找来吴法宪，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

该主动承担一些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算了。”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805 页）

可见，周恩来一开始就很明白这件事情的性质和分量，他想的第一件事是保持党内团结，保护“副帅”，要吴法宪承担责任，“说清楚算了”，而不是追查到底。谁最希望“攻到‘副帅’头上去了”，不言自明。吴法宪又说：“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同上，806 页）

现在不清楚催促吴法宪作检讨是不是周恩来自己的个人想法，但保护“副帅”肯定是周恩来的意思，不然，毛泽东不会揪住黄吴叶李邱不放。五大将的共同目的都是通过检讨保护“副帅”的。

说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要搞掉林彪，证据不足，但他需要林彪的态度，需要林彪服软，需要在党的历史记录中有林彪自认犯错误的白纸黑字的记录。这一点，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黄吴叶李邱是林彪一棵藤上的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林彪万一倒了，周恩来就是第二把手。可见周保“副帅”与五大将保“副帅”心态也有所不同。如果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又出了问题，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莫测，国家就要继续动荡，这是周恩来不愿意看到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了林彪，周恩来单独面对江青的势力，会更加艰难，更加危险。

但林彪似乎不领情。当天（8 月 28 日）晚饭后，吴法宪到林彪住处报告了周恩来要他写检讨的事，“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林彪却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 I 负责。”（同上 806 页）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内紧外松，做出一系列“内功”以撬动林彪班底，而周恩来却仍然在苦心积虑地照顾着“门面”和全局。周恩来曾奉毛泽东之命带着黄永胜等人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希望他参加批陈整风会，却碰了个软钉子。在那段非常时期，最希望保住林彪的，除了黄吴叶李邱，就是周恩来了。

吴法宪说：“周恩来一直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同上，751 页）这里的“我们”，吴法宪不仅指他们几个“大将”，实际上也包括了林彪。林彪在得知康生、张春桥私下议论周恩来应对“揪军内一小撮”负责时，亲口对吴法宪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

个总理的。”吴法宪表态：“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同上，752页）

我没有康生代理总理的印象，他从未当过副总理，怎么代总理？也许是指文革中临时指定他处理总理负责的那些事情？但吴法宪的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现实：党内谁执掌大权都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与林彪以及他的那帮人马，在对抗江青的事情上肯定是有共同语言的，如果要周恩来在江青和林彪两个集团中选一，他肯定选择后者。这说明：

一、文革中，林彪集团与周恩来是可以合作的，但江青集团却不行，他们视周恩来为眼中钉，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得民心，不可能得天下。

二、周恩来尊重、帮助林彪是出自诚心的，周在林彪的得失宠辱上没有直接的私人利益。甚至可以认为，即使从个人利益上讲，周恩来也不愿意因为林彪的倒台使自己变成决无好下场的第二把手。

林彪千错万错，错在乘机外逃；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纵容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参与政治。毛泽东、林彪，甚至刘少奇的后期，都有任用自己亲属的共同倾向，说明了中共党内封建传统的深厚基础。我们今天固然可以“百家争鸣”地讨论林彪究竟知道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林立果的那一纸“五七一”足以毁灭林彪以至其整个集团，根本没有回旋和解释的余地。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从副总统儿子那里搜出军事政变计划，无论当父亲的知道还是不知道，他那个副总统也肯定当不下去了。

一旦事情的性质发生突变，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再次显示了他处理危机事务的本领。但是，当林彪机毁人亡得到确认后，周恩来当着纪登奎的那番大哭，却清楚地显示了他心忧天下的深沉思虑。他已经成了第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周却没有一丝喜悦和得意，而是怀有沉重的忧患之情。

果然，两年后，毛泽东小题大做，故意发动政治局对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进行“大批判”，从二、三十年代的老账算起。为什么呢，因为周恩来是“二把手”，一定要给周再戴一个紧箍，确保在毛的身后不能让周掌权。

在那次批判中，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也不得不做出表态，但他的话却是这样讲的：

你（周恩来）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晚年周恩来》472页）

与其说这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批判”，不如说是邓小平对这次批周活动的真实看法，既可当作“批评”又可当成提醒——只有你距主席“一步之遥”，处



于以前刘少奇和林彪的位置，你自己要当心！这番话拿出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江青，都挑不出毛病，而周恩来本人更能听出其中的含义，真可谓一片苦心，苦心一片。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知这一点？他的那一番大哭，什么都包含在内了。

---

## 【热点研究】

# 从校刊《新北大》看北大文革

张 从

## 一、《新北大》校刊简史

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一个学校的校刊题名，历史上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文革中的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校刊《新北大》书写刊名。当时，工作组刚刚撤离，聂元梓成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主任，又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炙手可热之际。她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为北大校刊题写刊名，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她的支持，欣然同意，派人送来了亲笔题写的刊名。消息传来，北大上下一片欢腾。8月22日，《新北大》创刊号正式出版。

聂元梓对舆论十分重视，把校刊当成校文革的喉舌，委派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实为起草者，和她一起列席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杨克明为校刊主编。校刊开始出版后，内容主要是报道有关北大文革的消息，包括校文革的成立及组成人员名单，转载中央首长的讲话，批判和控诉陆平“黑帮”的“罪行”等。但杨克明是个有自己主见的人，并没有完全按照聂元梓的旨意办报。

1966年10月6日，物理系学生路远、周闯贴出了题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对聂元梓的权威提出挑战，要求她“自动退位，当一名普通的积极分子”；经济系教师杨勋写出了《北大文化革命又处在关键时刻》的文章，对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提出批评。

经杨克明同意，10月8日的《新北大》分别在第二版和第三版全文刊登了这两篇大字报和文章，之后，还陆续以大字报选登的方式刊登了一些批评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文章，例如10月13日第三版发表的“展览会突出什么？”，批评校文革举办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展览”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群众，而是突出了聂元梓个人，仅聂元梓的像就有20多幅。

10月20日-21日，校文革常委会上，第一副主任孔繁等常委与聂元梓的矛盾表面化（《北京大学纪事》766页）。10月31日，校文革决定改组以杨克明为

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北京大学纪事》766页）。此后，《新北大》完全被控制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手里，成为他们的忠实工具。

11月12日，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和北京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斗队等5个组织，因不满《新北大》对聂元梓11月1日《纪念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五周年大会》讲话中有关内容作了删改，派人砸抢了《新北大》临时编辑部，损坏了一些物品，抢走了印章、钥匙、笔记本等，11月17日，《新北大》临时编辑部发表声明，谴责他们的“暴行”。

《新北大》作为校文革的舆论工具，忠实执行了校文革的旨意，刊登了代表校文革意见的大量消息和文章，一方面表示他们紧跟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独创性”，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红色政权”的统治地位，残酷打击反对自己的群众组织和个人，把校刊当作了他们迫害反对他们的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得力工具。一直到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北大校刊才停止出版。

## 二、《新北大》的主要攻击目标

从《新北大》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看，其矛头指向的主要目标是：一、老一辈革命家、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二、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三、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和学生。

### （一）攻击和反对老一辈革命家、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

《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据统计，被他们点名批判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彭真、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李雪峰、李井泉、王任重、陆定一、胡乔木、杨成武、傅崇碧、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周扬、齐燕铭、刘仁、万里、邓拓、吴晗、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其中很多人点名的时间还抢在其他报纸的前面。

被点名批判最早的是李雪峰，1966年10月29日第三版，刊登文章：《李雪峰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11月5日第三版：《李雪峰是镇压北大6·18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11月21日第三版：《李雪峰六月二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

1967年1月20日第三版，刊登《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龙》，其中点了邓小平、彭真、李井泉、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等的名；

1967年1月20日第四版，刊登《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

1967年1月23日第三版，刊登《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剥削阶级本性难移》；

1967年1月24日第四版，刊登《陶铸跳出来以后》；

1967年2月4日第四版，刊登《王任重破坏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勾当》；

1967年2月10日第一版-第四版：《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少奇》调查报告之一；

1967年2月16日第一版-第四版：《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1967年2月25日第一版：《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第一版-第四版：《把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

1967年3月4日第四版：《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1967年3月11日第四版：《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陶铸七一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

1967年3月14日第一版-第二版：《谭震林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

1967年3月16日第三版-第四版：《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1967年3月18日第四版：《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痛击谭震林在农科院的反攻倒算》；

1967年3月21日第四版：《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完）》；

1967年3月25日第四版：《打倒谭震林》、第五版-第六版：《揭穿资本家代理人刘少奇的反动面目》；第七版-第八版：《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后台老板》；

1967年4月1日第二版：《彻底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三版：《刘少奇的狼子野心》；第四版：《控诉刘少奇委曲求全论对我的毒害》；

1967年4月8日第五版：《揭露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第四版-第五版：《〈论修养〉是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

1967年4月11日第二版-第三版：《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4月18日第一版：《〈修养〉是反革命复辟的黑纲领》；第五版：《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六版：《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

1967年4月22日第一版：《愤怒控诉彭真黑帮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滔天罪行》；第四版：《彭真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录》；

1967年4月25日第二版：《控诉彭真黑帮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行》；第三版：《〈修养〉是大叛徒刘少奇的自白书》；第六版-第八版：《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5月2日第二版：《刘少奇的全民文艺路线必须批判》；

1967年5月6日第三版：《打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第四版：《刘少奇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

1967年5月9日第五版-第七版：《评〈修养〉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第八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1967年6月10日第四版：《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

1967年6月14日第三版：《〈燎原〉是刘少奇篡党篡政野心大暴露》；

1967年6月17日第三版：《周扬是庇护反共老手朱光潜的大黑伞》；

1967年7月1日第四版：《批判胡乔木的大毒草〈三十年〉》；

1967年7月5日第三版：《打倒陆阎王（陆定一）》；第四版：《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1967年7月19日第二版：《彭真——地主资本家的帮凶》；

1967年7月21日第二版：《打倒刘少奇，打倒陈再道》；

1967年7月23日第二版：《打倒刘少奇》；第四版：《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1967年7月26日第一版：社论《彻底砸烂彭真》；第二版：《打断彭贼的脊骨》；第三版：《看落水狗彭真的垂死挣扎》；

1967年7月27日第六版：《从反党小说〈刘志丹〉看大阴谋家习仲勋的狼子野心》；

1967年8月2日第一版：《5·16通知前半年彭真反革命集团在幕后干了些什么》；第二版：《彭真丑史》、《彭真又放毒箭》；第三版：《刘少奇与奈温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

1967年8月5日第三版-第四版：《彻底批判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谬论》；第四版：《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罪行》；

1967年8月9日第一版-第三版：《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第四版：《徐向前——张国焘的干将》；

1967年8月16日第一版-第二版：《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我的残酷迫害》；

1967年8月19日第三版：《刘少奇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最大叛徒》；

1967年8月23日第一版-第二版：《〈人的阶级性〉和黑〈修养〉是一路货色》；第二版：《把肖华的反革命嘴脸拿出来示众》；第三版：《看陶铸的狼子野心》；

1967年8月26日第一版：《彭德怀的海瑞精神是什么货色》；第二版：《彻

底砸烂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第三版：《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

1967年8月31日第一版-第三版：《刘少奇全民国家论的破产》；

1967年9月10日第二版-第三版：《打倒老反革命大叛徒大保皇派陶铸》；第四版：《陶铸和南三家村黑店》；

1967年10月7日第四版：《大叛徒陶铸的自我写照》；

1967年10月15日第一版：《批判刘少奇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1967年10月19日第二版-第三版：《评王任重的〈读书笔记〉》；

1967年12月2日第四版：《彻底揭露刘邓出卖党在文教科技界领导权的罪行》；

1967年12月6日第三版：《从一二·九运动看刘少奇的老反革命嘴脸》；

1967年12月9日第二版：《批臭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党内和平论是刘少奇篡党的烟幕弹》；

1967年12月20日第三版：《刘少奇的好人党就是资产阶级党》；

1968年4月8日第二版：《戳穿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的画皮》；第三版：《反革命小爬虫傅崇碧是怎样把黑手伸进北大的》；

1968年5月15日第四版：《砸烂彭记国民党黑窝》，点了彭真、刘仁、邓拓、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人的名；《为谭老板画像（套曲）》攻击谭震林；

1968年7月5日第三版：《彭真破坏京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1968年7月26日第三版：《刘邓陶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1968年8月3日第三版：《砸烂贺龙反党篡军集团》、《罗瑞卿“军事即政治论”的反革命实质》。

1968年8月8日第四版：《刘少奇就是五次叛变的大叛徒》。

从以上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新北大》在文革的头两年中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部门负责人的攻击是十分全面的，这类文章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影响之广，在文革报刊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对当时已经被公开点名的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大肆攻击，而且对还未被公开点名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朱德、徐向前、习仲勋等人和革命烈士刘志丹也敢于点名攻击，这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从《新北大》刊登的以上文章和活动报道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中的重大活动和文革发动者、领导者战略部署的脉络，为研究文革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 （二）打击迫害干部与教师

北大校文革成立后，就把矛头对准了广大干部和教师，设立了劳改队和劳

改大院（即后来所说的“牛棚”），关押数百名干部、教师，而且在《新北大》上连续点名批判。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北大》先后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有：陆平、彭珮云、戈华、黄一然、翦伯赞、周培源、冯定、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傅鹰、张群玉、王学珍、陈守一、冯友兰、朱光潜、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冯至、伊敏、张侠、苏士文、张仲纯、杨勋、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王晓秋、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孔繁、杨克明、程贤策、王力、魏建功、游国恩、阴法鲁、倪孟雄、武兆令等。其中有北大党委和校级领导人，部门和系级负责人，也有著名学者、教授，还有一些只是普通教师。

例如，1967年1月31日第三版：《孔繁是人还是鬼》；《控诉孔繁杨克明在物理系的滔天罪行》；

1967年2月4日第三版：《孔杨有罪，罪该万死》；《揭穿孔繁的狼子野心》；  
1967年2月18日第一版-第四版：《把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

1967年3月4日第四版：《资产阶级两面派杨克明罪责难逃》；《杨克明和反革命分子杨勋一鼻孔出气》；

1967年4月1日第四版：《翦伯赞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1967年5月20日第一版：《把反革命老手翦伯赞批倒批臭》；第四版：《反共老手翦伯赞是刘少奇叛徒哲学的辩护士》；

1967年6月17日第三版：《周扬是反共老手朱光潜的大黑伞》；

1967年6月24日第三版：《把大叛徒黄一然批倒批臭》；

1967年7月19日第四版：《刘邓对冯定的假批判真包庇》；

1967年10月7日第五版-第八版：社论《打倒戈华》；《揪斗戈华好得很》、《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10月15日第三版：《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罪恶事实之二）》；

1967年10月28日第四版：《把反共老手侯仁之揪出来示众》；

1967年11月2日第四版：《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的画皮》；

1967年11月25日第三版：《斗争叛徒张仲纯（中文系副主任）》；

1967年12月14日第四版：《戳穿北大井冈山黑高参戈华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1968年1月7日第四版：《揭开反共老手季羨林的罪恶历史》；

1968年1月18日第四版：《陆平黑帮怎样把大小王八拉入党内的》，文中点了陆平、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张群玉、王学珍、伊敏、季羨林、冯至、周培源、侯仁之、周一良等人的名；

1968年1月22日第四版：《再揭反革命两面派季羨林的三反罪行》；

1968年2月8日第四版：《从陆平傅鹰狼狈为奸看旧北大资产阶级党阀学阀联合专政》；

1968年2月29日第四版：《陆平黑帮反对毛主席罪恶滔天》；

1968年5月8日第四版：《请看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的国民党杂牌军》，点了历史系教师周一良、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的名；

1968年5月21日第一版：《陈守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守一休想翻案》；

第二版：《让冯友兰的复辟美梦见鬼去吧！》；

1968年6月14日第三版：《毒蛇并没有冻僵》，点了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等教师的名；

1968年7月26日第四版：《反革命小丑郝斌休想翻天》；

1968年8月18日第四版：《砸烂古典文献专业这口活棺材》，点名批判“反动文人”魏建功、阴法鲁和程贤策、王力、游国恩等。

在以上被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中，戈华是原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在社教运动和工作组时期都是依靠对象，只因没有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就被校文革打成三反分子，派人到山东老家追捕，进行残酷斗争；孔繁和杨克明都曾是聂元梓的“战友”，杨克明还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都曾是校文革的成员（副主任和委员），因与聂元梓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资产阶级两面派”，清除出校文革，遭到无情打击；还有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如周培源、季羨林、侯仁之、周一良等人和一些普通教师，也是因为对聂元梓的极左行为和恶劣品质表示了不满，也被翻出历史老账，受到迫害和打击。

### （三）打击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学生

在文革中，北大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和镇压群众、独裁专制的邪恶力量，另一种是广大师生中存在的怀疑、抵制文革的思潮和要求科学民主的正义力量。聂元梓和校文革对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群众组织和学生一直给予坚决镇压，无情打击，把他们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有些还被抓进监狱关押（如杨勋、杨炳章、何维凌、胡定国、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等）。在校刊中对此也有充分反映。

1966年11月起，在北大出现了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的怀疑中央文革、反对聂元梓的部分学生组织，但这些组织很快就遭到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残

酷镇压。

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

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教师杨勋和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

1967年8月17日，北大校内反对聂元梓的五个群众组织《井冈山》、《东方红》、《北京公社》、《红旗飘》、《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被接纳为首都红代会的成员。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有干部、教师、职工、学生7000多人，从此北大里出现了与聂元梓和校文革对立的强大的反对派力量。聂元梓和校文革十分惊恐，依仗着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支持和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搞垮井冈山兵团。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公布了《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把学生牛辉林打成“反动小集团坏头头”、把学生樊立勤打成“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干部戈华打成“反动小集团黑高参”；

1968年5月23日第一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第二号公告》，把干部张侠、学生张景元、俞启义打成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第四版：《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点了学生谢世扬、胡伯安、胡振初、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余水荣、臧希文、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刘立炎、范永奇和教师苏士文、杨勋及其弟杨炳章的名；

1968年6月14日第四版：《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把化学系1963级学生樊能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8年7月17日第三版：《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

1968年7月23日第三版：《我校首次公审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泰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被校文革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集团成员”的学生，虽然在工军宣队进校后有些人继续受到了审查，但绝大多数都按期毕业分配，少数被留校审查延期毕业的在文革结束后也都得到了平反。他们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努力工作，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其中杨作森、徐运朴因遭受批斗



身体损伤，不幸过早离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头”的法律系64级学生牛辉林，1970年分配到山西农村后，从公社秘书作起，先后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定襄县委宣传部理论组组长、山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共青团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太原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引黄工程总指挥部秘书长、山西省引黄工程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2006退休，2013年因病去世。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1970年被分配到河北衡水地区，1978年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完成硕士学业后又攻读博士，后成为教授、有机化学专家。

### 三、《新北大》校刊的衰亡

1968年3月29日，校文革支持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将31号楼内的井冈山兵团学生驱赶出去，北大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大部分学生纷纷逃离学校，新北大公社围困了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兵团占据的几座学生宿舍楼，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4月份，清华大学也爆发了长达百日的武斗，并使用了枪、手榴弹、土坦克等。武斗期间，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曾派人调解，要求制止武斗，但没有效果。7月27日，毛泽东在事前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指派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遭到蒯大富一派的强烈反抗，工人伤亡惨重。7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随后派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京高校。北京大学的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是8月19日正式进驻的。在7月28日至8月19日期间，聂元梓和校文革虽然已经预感到他们掌权的时日不多了，但仍在充分利用《新北大》这一舆论工具，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攻击，叫喊要两派“在校文革领导下实现大联合”，新北大公社总部在7月30日《新北大》第二版的声明中再次“命令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等人，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牛辉林，交出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漏网成员李怀进、屈长江、何本芳、唐竞以及樊立勤、张景元、俞启义，以立功自赎，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必将从严处理。”

8月17日，《新北大》出版了第200期，在第一版上发表了纪念毛主席为新北大题字两周年的编辑部文章，在第三版上校文革发表了最后一个“号召书”，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了最后一个声明，仍然坚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的红色政权，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校革命大联合必须在校文革领导下进行”。

1968年8月18日，《新北大》在出版了第201期后，便销声匿迹，寿终正

寝了。次日，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北京大学也从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掌权时期进入由军宣队、工宣队掌权的历史时期。

#### 四、文革小报在研究文革历史中的史料意义

《新北大》从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其题字到1968年8月18日出版第201期停刊，存在了整整两年，这两年是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篡夺北大权力的两年，是他们积极执行极左路线残酷迫害打击北大干部、教师和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学生的两年，是他们破坏北大科学民主的传统，实行专制和愚民政策的两年，给北大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作为校文革的喉舌，《新北大》配合校文革，对老一辈革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攻击，对校内干部、教师和学生进行打击迫害。《新北大》刊登的大量内容成为聂元梓等人的罪证，也成为研究北大文革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文化革命中，曾经出版发行过大量的群众组织“小报”，这些小报记录了文革各个时期各地的重要活动，是研究文革的珍贵史料。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小报多已被毁掉或失散，有少数流落民间的小报现在成了“文物”，有些在网上拍卖，一张品相好的小报甚至卖到几百元；而官方图书馆收藏的比较完整的文革小报和其他资料却不对外开放，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最近看到有的民间收藏者收集了大量的文革小报并进行了整理，这对保护文革史料无疑有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仅仅是收藏而不利用起来进行研究，将大大降低这些资料的价值。希望各地图书馆允许研究者查阅文革小报等资料，民间收藏者也不应将其藏品秘而不宣，如能制作成电子版提供给研究者，将使这些资料在文革历史研究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

【生逢乱世】

#### 一个军校学员的文革回忆

陈彬生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人生非梦》第五章《军魂》中有关以军事院校学员身份参加文革的部分内容。其中有关冷兵器武斗和“八二八”惊魂部分曾以“秋雨”笔名在本刊第35期“重庆武斗专辑”中发表。此次重新作了修订。

## 初到山城

1966年8月18日凌晨4点，我从萍乡乘火车赶赴重庆。当年的火车要跨越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历时50个小时，抵达山城重庆已是20日早晨6点了。

后来我才知道，“八一八”，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给“文革”初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打了一支强心针，文化大革命运动将很快席卷中国大地，掀起一场狂风巨浪。当然，这个时候大串联还没有开始，大风暴还没有到来，火车上情况也还正常；刚刚从相对比较封闭的福建沿海的野战军部队走出来，我还没有进入角色，封闭保守的心态让我感觉不到一点文化大革命的气氛。

重庆火车站濒临长江，设在长江北岸，受地形限制，这里没有宽大的车站广场，也没有拥挤的公交车站。出得站来，迎面便是立于山坡上的高楼，说是高楼，也只是6、7层而已，不过在当年已经是很高了，贴在山坡上的这些高楼看上去摇摇欲坠，不知住在其间的人们是否会心惊肉跳。一条约成60度的缆车道斜挂在山坡上，两条轨道一上一下运送着过往的人流；右首有一条街道通向市区，与其说是街道，不如说是盘山公路更加贴切一些。

我乘坐缆车到达上面的两路口，这里便是繁华的闹市区了。马路都是随着山势起伏弯曲的，几乎没有一段超过500米的平坦笔直的街道；大街上没有看到什么公共汽车，那个时代公交车辆的动力没法在这样的街道上行驶，所以，山城运行的主要是车顶上斜翘着两条长“辫子”的无轨电车；大街上也没有自行车——高低不平的马路不能让自行车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

我找到两路口附近一条小街旁的学校招待所，十来间客房里清一色的军用物品，非常简陋。因为学校设在离此40多公里外的北碚区，陆续报到的学员便在招待所等候，以便集中转运。趁这个机会，我拜访了在重庆通信兵雷达学校执教的一位族叔。

重庆地处西南山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当年，这里是大三线城市，很多军工企业和军事院校都迁建在这座城市里。据我所知，仅重庆市区沿江一带就有望江、长江、嘉陵、江陵、建设、长安等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大都是抗战时期从内地迁来的，文革前开始大搞三线建设时，进行了合并扩充，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常规兵器基地。重庆地区的军事院校当年有7所，其中大学3所，分别是通信兵工程学院（总字412部队）、后勤工程学院（后字242部队）、第七军医大学（后字245部队）；中专4所，分别是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总字421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总字424部队）、机要学校（成字302部队）、炮兵学校（总字153部队）。

抵达重庆的当天下午，我就到石桥铺的雷达学校拜访了族叔陈宾发。这位叔叔是四房的后代，生于1937年12月，比我大6岁半，他于1960年毕业于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也是我即将进入的学校），毕业后一直在通信兵（部）所属院校任教，退休时为正师级副教授。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叔叔还没有结婚，住在单身教工宿舍里，当时大概还是助教吧。因为是远房叔侄，又都在外读书，我们原来并不认识，所以这次见面只能是认个家门。既是一家人又都在重庆，而且是同一系统的军事院校，也算有缘，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 军校印象

8月22日下午，该到的学员基本到齐，我们乘车赶赴北碚西南的歇马场，重庆通信兵技术学校就在歇马小街的东侧。

这是一个占地足有200亩，戒备森严的大院，大门口有重庆警备司令部派驻的荷枪士兵昼夜警卫。进门50米左右立有一个照壁，上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朱红大字；照壁后面是一个硕大的操场，再往后就是一座四层楼的教学大楼。照壁前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往东延伸将近2公里，分别是办公区、宿舍区、医院、实习工厂、靶场等；往西不足200米，有三栋两层楼的学员宿舍和一个大食堂和相应的澡堂等配套设施。我们新来的三个学员中队就被安排在这里。（右图：本文作者在军校时留影。）

我被分配在203中队8班，中队是一个连级建制，下设8个班，每班12人，我们8班安排在2楼窗户朝西的一间宿舍里。也不知哪个没有脑子的设计师，这么开阔的院子里，竟然将宿舍设计成坐西朝东。在重庆这个著名的“火炉”里，又没有电风扇之类的设施，我们这个当西晒的房子，夏天该怎么熬过去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天，指导员余广达与新学员见面，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提了一些要求；然后便开班务会，互相认识一下。8班班长曹忠林是湖南攸县人，来自福建84师；班副陈恩祥是北京西城人，来自北京卫戍部队；其他同学还记得有河北蠡县的刘书献、江西波阳的罗时忠，还有广西、西藏等地的。

校园内绿树成荫，环境非常优雅；游泳池、图书馆、医院、礼堂、运动场等一应设施齐备，学习休闲、生活娱乐均很舒适。对比当年的南昌蛟桥机械工业学校，真个是天差地别呀！看到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我真的很高兴，心想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通信技术人才，为军队效力，为祖国献

身。这还真不是套话，确实是我当时发自内心的感受。

## 风暴袭来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我即将要拥抱理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突然涌进平静的部队校园，我们这批新来的学员立足未稳，就被淹没在汹涌的波涛中。通过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的思想被“彻底改造”，最后搞得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吧！在两年的军校“深造”中，我和我的学友除了对“老三篇”背得烂熟外，什么技术也没有学到。失去了一次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军人来说，的确是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也在我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8月29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一队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红卫兵突然涌进校园，搅动了我们的心房。“革命”和学习，这时便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要么走出校门去“造反”，要么“只专不红”不革命。二选一，有谁敢戴“不革命”这个大帽子呀！

9月15日，部分老学员又来串联、鼓动，我们终于被狂涛卷进了漩涡，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起来。

此时，校园内的大字报几乎在一夜间就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校领导。当时全国都在揪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各级领导都是打击对象，校领导自然要躺着中枪，这也不足为奇。要体现自己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人人都得写大字报，否则自己就会成为被批斗的对象。

为了表明自己是革命者，我们8班推举我执笔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就叫“论持久战”。我是仿照毛主席的原著创意的，以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为基本论据，其中提出了一个“在现任党委领导下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可行的论点，引起了全校轰动。后来差点被剥夺参加北京国庆典礼的资格。

1966年的国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次庆典自然要突出“文革”这个重点。所以，参加国庆典礼的“护花”部队选择了军队院校的师生。我们学校是每个班选派一个代表，大概是我代表8班同学起草的大字报起了作用，我们班无记名投票推举了我参加。而校领导又对我的大字报有些反感，在审查人选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只是最终又害怕背上压制“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罪名，还是开了绿灯。

## 国庆节“护花”

9月28日上午8时，我们乘坐的专列抵达长辛店，由全国通信兵院校推选的1600人都陆续到达，我们将组成一个方队，与其他院校的方队共同保护天安门前组字方阵的祖国花朵。

29日上午，听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作报告，晚上观看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队演出，通信兵部江文主任和黄政委等一同观看演出并讲话。

30日晚上10时30分，大家带足了一天的干粮和饮水，就乘车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到达指定位置时已经是次日凌晨3点多了。北京的秋夜很冷，坐在天安门广场的水泥地上等待国庆典礼开始，寒气袭人，大家不停地起身活动，驱散身上的寒气，急切地盼望着国庆十点钟的到来，渴望亲眼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队伍成“U”形分布，组成50层的人墙，任务是保护组字方阵（组的什么字我们看不到，要站在天安门或观礼台上的人才能看到）的少先队员，标准是不能让一个小朋友受到伤害。我的位置大约在后面靠东倒数第五六排的样子，具体编号忘了。这个位置虽说比起后面的群众队伍离天安门近多了，但仰望城楼，还是只能大体区分城楼上的人的轮廓，并凭借平时的印象知道高大身躯的毛主席在什么位置。

上午十点整，庆典开始，林彪作简短讲话后，就开始游行。那天的游行队伍大部分是红卫兵，据说有200万人，由于大家都想看毛主席，队伍的行进速度很慢，有时毛主席稍事休息，游行队伍便停滞不前，结果直到下午4点左右才结束游行。这时，广场上的群众队伍按次序向天安门推进，我们全体军人手挽手保护着少先队员走在最前面。开始，秩序还不错，大家依次前进，但不出5分钟，后面的群众队伍就哄涌而至，势不可挡，就连我们这支手挽手的50排人墙也被冲垮，身不由己，有时甚至脚不沾地地被推拥着朝金水桥流去。为了保护孩子，我们立即执行第二方案，三人一组抱成团，让孩子们躲在中间，尽力顶住人流，留下孩子喘息的空间。

在集中精力关注孩子安全的同时，耳边只是狂热的喊叫声，发自人们内心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有节奏地响起，人们手举《毛主席语录》，瞪大眼睛望着天安门城楼，身子则“随波逐流”，直到金水桥头，如潮的人流才逐渐停止前进。这时我的位置离最东边那座金水桥约20米远，遥望城楼，毛主席的身影已经很清晰地呈现，但脸部还仅仅是能分辨五官而已。在这里停留了多久已经没有印象了，反正是直到城楼上的中央首长离去以后，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慢慢散去，我们也回到原定位置吃饭喝水，准备观赏晚间的焰火晚会。

晚上的活动比较随意，规定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后，大家可以在广场上自由活动。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烟花似锦，天安门和周边的大会堂、博物馆、

前门等建筑被彩灯装点得灿烂辉煌，巨大的探照灯光束在夜空中交叉晃动，首都北京融化在灯光的海洋中，火树银花不夜天啊！在京的文艺团体分布在广场的各个地方表演歌舞节目，部分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也来到广场与民同乐，一派太平盛世、繁华都城的景象。

在京的日子里，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们参观了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石油学院等名牌大学和军博、革博，听取了石油部门 32111 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的事迹报告。更值得一提的是，10 月 5 日，我们参加了总政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事院校师生 10 万人大会，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主持，陈毅、叶剑英副主席和杨成武代总长分别讲了话。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要点是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参照地方的做法，中断党委领导，开展“四大”，允许串联。

## 大串联 40 天

10 月 13 日零点，我们离京返渝。23 日，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决定成立筹委会取代校党委，从此也和地方一样“踢开党委闹革命”了。中央决定军队院校“中断党委领导”的决定后来证实是错误的，但当时却是毛主席同意的，据传毛主席还说：军队院校 111（所），确实有妖嘛！不管怎么样，倒还是印证了我的大字报提出的论点。这以后，学校就彻底处于无政府状态，师生纷纷外出大串联，谁也管不了谁了。

10 月 29 日，我与班副陈恩祥打起背包也开始大串联。本来我俩是留守的，



其他同学已先期到北京去了，但在学校实在无聊，便决定再次赴京，陈恩祥也好回家看看。由于北京人满为患，进京火车票已经停售，我们俩便“曲线救国”，拿了到石家庄的学生免费车票，第一站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左图：本文作者与战友陈恩祥大串联时在北京留影。）

11 月 2 日，抵达石家庄就听说次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铁道学院的陈恩祥的女朋友帮我们购买了两张到北京的普通车票，我们又连夜进京。3 日凌晨 3 时到西直门，市区已经戒严。我们凭军装随便就插入了一支学生队伍，直到下午 5 时才进入东长安街，却听到大会结束的通知。等了一整天，却没能见到毛主席，很多红卫兵都伤心地哭了。当晚我们就寄宿西直门小学。

11月4日，到通信兵院校师生接待站，被安排在远离市区的阳坊通信总站住宿。5日，到通信兵院校师生接待站与先期到达的本班其他10人取得联系。

10日，毛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14时38分，乘军用卡车通过天安门。

11月13日16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周恩来、陶铸、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等接见军队院校师生。记得陈毅在讲话时还煞有介事地说：请同志们翻开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大家哄然大笑，当然也有呛声的，不过，周总理当即证实，毛主席的确这样评价过陈老总。

14日晚，我与陈恩祥离京赴上海串联。火车上已经是无插针之地，就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甚至有的厕所也被挤占，最多站过四个人。我们两个军人倒是有点面子，在毛主席“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下，红卫兵争着给我们让座，只是作为军人，平时都是给别人让座，有点不好意思，偶尔坐上一会，便起身了，还是站着踏实呀！列车在山东一个小站停留了5、6个小时，那时列车上什么都停了，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没有广播，没有乘务员，大家干等着，也不敢下车。附近的老乡提了一些窝窝头来叫卖，5分钱一个，倒也没有漫天要价，我买了三个，结果咬一口尽掉渣，没有水，实在咽不下去。就这样靠几个从北京带上车的苹果，我们挺到了合肥。

17日下午，我们到达上海。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第二军医大学、鲁迅纪念馆、上海工业展览馆、延安区（静安区）革命造反展览、乌鲁木齐路“水晶宫”展览等。这个所谓的水晶宫，也就是一个用镜面玻璃马赛克贴墙的卫生间，只是当时在极大部分家庭都还没有卫生间的情况下，显得刺眼而已。参观之余，我就在二医大接待站专事刻写油印红歌和宣传资料。当时那股热情和干劲的确是油然而生的，记得一共刻了12张蜡纸，印刷了数百份革命歌曲，光在油印机前我就连续工作了13个小时，这些宣传品后来都在回重庆的火车上散发给了旅客。

本来我们打算下一站去广州，因为18日国务院发出了停止串联的通知，就响应号召取消了广州的行程，并领取了12月2日到重庆的火车票。列车晚点，我们直到7日早晨才抵达重庆。

这次大串联历时40天，还真是一心一意学习取经，没有半点杂念。那个时候，我们毫无游山玩水的概念，至少我和我的本家战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也不是我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那个时势和氛围就有那么纯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也许是某些人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但却是我们的真实思想和实际行动，虽然后来证实我们有些看法和做法或许是错误的，我却始终认为，我们的丹心苍天可鉴。



## 电报没有火车快

大串联返校不几天，电波传来噩耗，母亲于十一月初一日去世。尽管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母亲还不到 45 岁呀！她应该多活几年，至少要享受一下两个儿子出息之后的孝敬啊！然而，她却带着遗憾、带着不甘走了。

我是 12 月 13 日收到电报的，学校立即安排我探家奔丧，我也即刻发回电报：待我回家安葬。当天我就急匆匆登上火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任凭心急如火，还是拖到 16 日上午才回到家。这时，家里已经冷冷清清，母亲两天前就入土为安了。我很纳闷，为什么不等我见姆妈最后一面呢？父亲也很奇怪，儿子怎么回来了哇？原来，父亲认为当年我已经两次探家，部队不可能再允许我回来了，就按当地习俗从简，死后三天即下葬。至于我的电报，他莫名其妙，哪里来的什么电报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回家第二天，大队部才派人送来刚刚收到的电报。在慢吞吞的火车上心急火燎的，安知它的速度竟也快过电波，我无话可说。

17 日，石甲坊大队组织部分社员和小学师生在我的家门口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母亲下葬三天了，才开追悼会，除了对我母亲十余年的接生事业予以肯定外，恐怕主要还是做给我看的。大队团支部设立图书室时，时任团支书的欧阳水全给我写信征集图书，尽管我每月仅 6 元津贴，还是买了几十本有关农村方面的书籍寄回，也许他们还记着这件事。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领这份情的，也会记着这份情的，日后图报吧！

1967 年元旦，我回到重庆，又去拜访宾发叔。也巧了，他这天与婶子刘正蓉结婚，没有婚纱，没有婚礼，就是在学校一间小会议室开个茶话会，几斤糖果，一杯清茶完事。当年大都是这个样，也算是潮流吧。我是巧遇，他有请客，我有备礼，一切从简，说几句祝贺话，吃几颗喜糖，这也是缘分啊！

## 在军队院校联络站

1967 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提出“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总攻击”。这篇社论的煽动作用之大是不可估量的。全国各地很快陷入“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大动乱中。

1 月 23 日，我被本校“红联”派往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工作。这是重庆 7 所军事院校组成的一个联络、协调机构，没有实际权力，只负责信息

交流和某些重要的统一行动时的组织联络工作。联络站设在后字 242 部队（后勤工程学院，当时对外都只称代号）的八一楼里，工作人员就住在二楼。因我是新学员，连本校的许多老学员都不认识，对联络站里来自其他院校的工作人员我更不认识，联络站由谁负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 242 部队红总（红色造反者总团）的人在里边起主要作用，其他各军校都只派来了一两个人。吃饭就在 242 部队食堂，免费供给。外出差旅费各自回本校报销。

1 月 27 日，重庆七所军队院校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部分地方造反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到会约 10 万人。

1 月 29 日，已经在驻军支持下完成了对重庆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重庆市工农兵学商各界造反派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联合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到会群众超 20 万。我们联络站参与了两次大会的组织工作。

不久，在联络站驻地的八一楼里，发生了震惊山城的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跳楼自杀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还得从西师八三一说起。西南师范学院也是地处北碚的一所大学，该校的八三一战斗纵队，属重庆造反派中与重大八一五相对立的一派（后来称“反到底”派），在北碚，当时几乎完全被八一五派控制，西师八三一是唯一一个掌握学校大权的反到底派别。有一天，八三一一个成员听到八一五一个好朋友的“忠告”，说他们在红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说的“红楼”是什么地方）的人已经掌握了罗广斌是叛徒的确凿证据，反到底很快就要完蛋了。这个消息立即被八三一头头知道了，他们果断采取突袭行动，当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抄了红楼，并带回了大量八一五整理的资料。其中果真有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看守所逃出后的全部轨迹材料，我的印象中，那材料说，除罗广斌外，其他人都陆续死于非命……意图说明罗广斌就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布置有特殊任务放出来的，其他人都已经被灭口了。八三一的头头看了这些材料大为震惊，不知所措，便求助于我们联络站。

我和几个人连夜驱车赶到西师，略略地浏览了这些资料，那份有关罗广斌的材料是我们几人轮流传看的。随后我们连夜回到联络站，次日（大约是 2 月 1 日）便召开联络站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后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将那份材料立即送交中央文革，请示处理意见；二是把罗广斌控制起来，不要让他再出什么意外。这两条意见反馈给各校组织的头头后，我们也就静候指示，不再过问了。

5 日下午，我听说，罗广斌被北航、哈军工、重庆红卫兵司令部和我们的联络站的人一起从文联家里带来，关到了我们联络站所在的八一楼 3 楼。当时每天的

形势瞬息万变，都很忙乱。所以我也没有上楼去看看。

5天后的2月10日早上，8时30分左右，罗广斌要上厕所，两个看守他的学生站在门外等待，想不到他竟从厕所窗户跳下，自杀身亡。我是在被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急忙起床来到楼下，只见罗广斌脸朝下趴在水泥地上，脑浆四溅，惨不忍睹。因为看到了现场情况，当天大家连饭也吃不下。

罗广斌的死，立即惊动了整个山城，他毕竟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小说《红岩》的作者呀，江姐等共产党人在狱中斗争的故事感动了至少两代人，他的死自然会引起极大的震撼。何况，重庆两大造反派为了自身的利益，都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罗广斌的历史我无法下结论，但罗广斌的死我却是见证，他跳楼自杀身亡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却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解读。

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串联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按照军委的指示，2月13日，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也宣布撤销，仅仅运作了20天便寿终正寝，这也许是文革历史上最短命的一个群众组织。

由于之前联络站派出的一个工作小组在开县被当地一派群众组织围困，我们决定在解散前必须把他们弄回来。

2月14日晚，联络站组织了约50人的队伍夤夜驱车直奔开县。15日22时抵达开县县城，连夜部署营救方案。16日，分组调查开县两大派系情况。17日，上午大造舆论，支持先期到达的同志；下午3时，带上被困战友紧急撤离。

然而，我们还是低估了被我们视为“老保”的开县工农总部的能量，4时20分，我们在陈家村被一批村民拦住，6时，开县工农总部强行将我们带到红星公社，并组织“辩论会”。那天晚上，我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他们敢对解放军出手，一定是有恃无恐。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了。

2月18日凌晨2点，双方终于达成妥协，我方派代表回开县与他们继续辩论，其余人回渝。6时，我们赶到万县与支左的7799部队联系，受到热情接待，并答应帮助要回被强行留下的代表，我们也在他们的支持下顺利返回重庆。

## 中间道路走不通

结束联络站的工作以后，重庆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形势日渐紧张。2至3月，重庆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在驻军和公安部门的支持下，宣布一些反对“革联会”的组织为非法组织甚至是反革命组织，强行取缔，并拘捕了上千人。这一行动加深了两派的矛盾。5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中

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或《中央五条》），要求 54 军纠正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为被宣布为反革命的组织和被抓捕的群众平反。此后，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的矛盾冲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激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武斗。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比较混乱，孰是孰非难以辨别，立场也出现了反复。3 月 20 日，我申明退出学校的造反组织“红联”，4 月 3 日，我又决定重返“红联”。这种左右摇摆不是意志坚定与否的问题，而是对文革前景不明朗、结果不可预料的纠结。

重庆最早的造反派都叫八一五派，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八一五的组织，后来有的人认为重大八一五“右了”、“修了”，已经沦为“新保皇派”了，围绕革联会的争论，便出现了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后改称“反到底”派），西师八三一就是其中的代表。

反击“二月逆流”开始后，我校红联还在徘徊当中，对于重庆两派难以决断，坚持主张促进大联合。5 月，红联派出多个工作组、观察组到地方工厂、院校做调查，我被派到沙坪坝的棉纺二厂、重庆大学等地做过近 10 天的调查，后来根据各组反馈的意见，红联仍坚持保持中立并尽力促进大联合的立场。

6 月 8 日，我们一个三人小组再到棉纺二厂调查时，先前已经驻该厂的 412 部队红总人员因不满我们的中立立场，还组织人围攻我们这个三人小组。由于两边不讨好，我们的处境很艰难，在那个非左即右的年代，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奢想两派联合更是书生气。

6 月 10 日，我校红联最终表态，决定支持反到底派，北碚势单力薄的西师八三一欢喜若狂，八一五则视我们为眼中钉。其时军队院校中支持反到底派的只有 242 部队红总力量强些，424 红联的表态无疑让八一五派嫉恨，他们别出心裁地把我们两个院校的代号相加，称之为“666”。“666”是一种剧毒农药，现在早已禁止使用了，年轻一代可能不知道。把我们比喻成“666”，这也说明我们这两所军校群众组织的力量和影响，而这就埋下了武装攻打我校的伏笔。

## 亲见的两场冷兵器武斗

这一年，我亲历了三次武斗场面，见证了从初级到高级武斗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大约是在重庆医学院附近马路上（具体地点记不清了）。武斗双方从年纪看不像是中学生，要比中学生稍大一点。这次武斗很像拍冷兵器战斗的古装片，双方人员各组成一个约 200 人的方阵，头戴安全帽，手持一根长约 2 米的钢管，钢管一头焊上了尖尖的铁矛头，他们步伐整齐，进退有据，你来我往，从不

乱阵。当一方发一声喊齐步前进的时候，对方则齐步后退，退到无路可走时则齐声大喊，奋力反击，直逼得对方节节败退。方队后面是一些“游击战士”，不时向对方投掷石块，双方都有人受伤被抢救出方阵，但队伍始终不乱。如果不是伤者头破血流的真实场面，我一定会认为这是在演戏或者拍电影。

我看了数十分钟，他们一直没有正面接触，觉得双方似乎是在斗毅力，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武装文斗”，除了石块的攻击见血外，钢钎的功能只是吓唬人。山城的武斗还没有到刺刀见红的肉搏战阶段，但又长又尖的钢钎预示着离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

1967年6月份各地武斗逐步升级，规模越来越大，打死人的事件相继发生。5日，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增援，拉开了重庆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从此武斗不停，死人不断。

22日晚11时，我乘船连夜进入望江机器厂（兵工厂）考察。在这里，第二次看到了一场冷兵器战斗。

24日凌晨，望江反到底的“金猴”对八一五的“八一兵团”占据的最后一幢楼房发起攻击，场面惊心动魄。

八一兵团最后的据点是一座三层宿舍楼，一楼的窗户全部砌砖封堵了，大门也砌砖封堵，仅留一个小门出入，小门内24小时派人把守。“金猴”制定了从屋顶突破的方案，并组织了敢死队登顶突击。一架拼接的长楼梯搭上了屋檐，楼梯的半腰绑上绳索，两个队员不顾从楼上窗户中砸下的东西，紧紧拉着楼梯；对方则从二三楼的窗户中用竹竿推楼梯、捅爬梯的人，企图将楼梯推倒或将爬梯人捅下梯子，双方都极尽全力对抗。只见“金猴”一名十六七岁的小将好似猿猴般轻巧，十来秒钟就登上屋顶；第二个人接着往上攀爬，刚到楼梯中间，“啪”的一声脆响，楼梯拦腰折断，登攀人应声落地，估计伤的不轻。

“金猴”队这下慌神了，一边急忙送伤员去医院，一边快速接续断梯，还得紧急调集人员支援。最让人揪心的是第一个上去的孩子，此时“八一兵团”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反扑，屋顶上冒出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居高临下，拿着棍棒直逼那个孩子，看热闹的人都为这个孩子捏了一把汗，心想，这孩子完了。

我也死死盯住这个孩子，担心着他的下场。他发现前有强敌，后无援兵，孤身作战，只能破釜沉舟，便横下一条心，发疯似地主动进攻。他抓起屋面上的机瓦，一边掷向对方三人，一边勇往直前，毫不退缩。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三个人看见这个“拼命三郎”，毫无斗志，被逼得节节后退。

此时，“金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高压水枪，对着“八一兵团”三个人直射，给了楼顶的孩子有力的支援；楼梯也重新搭上去，后续队员一个接一个冲向楼

顶。“八一兵团”见大势已去，宣布“投降”，一个个举起双手，很不甘心地离开了他们战斗生活的最后的据点，望江从此成了反到底的天下。

## “八二八”惊魂

7月3日，我应邀到邮电学院帮助军训一周，11日返校时，不想北碚武斗严重，公共交通中断，我只得转道并步行15公里才回到学校。

23日，西师八三一撤离西师校园并寄居我校，北碚也完全成了八一五的天下。只有我们424部队一家在此苦撑。对方凭借权力，把我校的粮食供应和财务资金也冻结了，全校陷入了八一五派全面的封锁之中。

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已经非常严峻。8月2日，“红联”下发了自卫武器，我们持有的是56式半自动步枪，每人20发子弹。

15日，学校派出多个工作组到附近宣传，希望缓解紧张局势。我与另外两人到红岩街、向阳红小学等单位开展工作。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八一五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也下定决心要铲除反到底在北碚的最后一个堡垒，战斗一触即发，只能等他们定日子了。

8月28日，这是一个我和我的同学永远不会忘却的日子。头一天晚上，火炉重庆闷热难当，在连电风扇都没有的宿舍里，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后半夜刚刚入梦，凌晨4点，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全体学员几乎在1分钟之内就离开了宿舍，并持枪到达了指定位置。我们都是至少有两年军龄的野战部队老兵，作风非常老到，紧急集合是家常便饭，枪声就是命令，此时不需指挥，大家都自觉进入战斗位置待命。

不久就传来消息，刚才的枪声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与八一五派的进攻人员接火，对方来势凶猛，号称10万大军，我校水电已被切断，大家要有没吃没喝的思想准备。看来形势比我们预料的严重得多，大家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

我们全校师生按预案退守到那座四层教学大楼，因为这里有全军从最古老到最先进的通信装备，是重庆警备司令部重点保护的单位。八一五的靠山是警司，自然不敢轻易攻打这个禁区。果然，他们的炮弹落在了教学大楼的两边，学校的游泳池被炸塌了，一块绿地也成了大水坑，但大楼始终没有受到炮轰。

我和几个战友的位置在教学楼三层南侧，窗口正对着操场，虽然有人试图通过大操场进犯，但在我们的精准火力下也不敢贸然推进，只能龟缩在照壁一线의树丛中等待机会。教学楼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大操场一览无余，无险可据，对方要进攻还真不容易。可是我们却水米未进，酷暑难熬。

不久，他们动用操场对面小山上一挺高射机枪攻击，有一发子弹穿透了大楼

的三道墙壁落在走廊北面的房间里，有人看了说，这是高射机枪的子弹，杀伤力极强。大家惊出一身冷汗。看来靠一堵砖墙隐蔽自己是不行了。我们很快调整部署，将大部学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南面只留下警戒人员。

由于其他地方的人员撤离不够迅速，不久就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其中有我校的教务处长和西师的一个女学生。后来听说，我们学校的师生一共死了8个，地方两派死伤就不得而知了。

八一五除了早晨开始进攻时轰了几炮、并与我方有短兵相接外，以后就只有零星战斗，双方僵持在教学大楼。鉴于我们的实力和大楼的重要性，八一五不敢大举进攻，他们的目的是逼走我们，而且控制了我们的水电命脉，有绝对的胜算把握，所以也不着急。我们在38、39度的高温天气里，滴水未进，粒米未尝，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耗到下午4时，指挥部终于下达了撤离命令，先遣队推倒了后围墙，利用后山的有利地形开始撤退。

我们朝西北方向突围。后面200多米外的一个山头上，八一五部署了一挺机枪，“哒哒哒”的点射非常内行，机枪手应该出身军人。我们必须通过一段空旷的斜坡地，大约30米上下，机枪就对着这段斜坡疯狂扫射，这是生死攸关的几秒钟啊！我们利用点射的间隙单兵通过封锁线，可能是距离较远，也可能是射手技术一般，当然也是由于我们有一挺轻机枪掩护，大家基本上都顺利通过。

轮到我了，我憋足一口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弯腰猛跑，快到安全地段时脚下一滑，身子扑倒在地，几乎是同时，一梭子弹打在身子上方的坡地上，我顺势一滚，跌进下面的水沟里，捡回了一条命。由于那个瞬间的生死界限仅在毫发之间，在后面等待的人一声惊呼，大家都认为我是被击中倒地滚下去的，心想这位同学完了。后来听说，这条封锁线上还是被那挺机枪打死了一人。

过了这个坎，后面的路程就没有危险了，我们转而向南翻过一座小山，走了也不知道多少里路，直到晚上8点才在一个小镇上吃上饭——已经26个小时水米未进了，早饿过了头，稀里糊涂填饱肚子又赶路。当晚就住在璧山的一个粮管所里。

第二天赶到永川，一趟开往成都的旅客列车在半路上临时停车，把我们这些汗臭熏人、溃不成军的武装军人接上车，弄得车上的旅客莫名其妙、惊诧不已。

成都，四川首府，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而且是被人家净身赶到这里的，那个狼狈相，让人百味杂陈，不堪回首。我们仅仅穿了一套单军服，提了一支枪撤离学校，其他什么也没有带，算得上是一贫如洗了。多亏成都某军校（因日记中断，忘了番号，不知是不是成都的空字028部队）的战友捐赠，我们得以吃穿不愁，立身有所。

关于这场武斗的具体情况，后来有许多报道，其中有一篇《1967年重庆武

斗大事记》是这样描述的：

“8月28日，八一五派武斗队凌晨向反到底派占据的北碚歇马场解放军总字424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发起进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424部队红联等撤离。至此，八一五派占领北碚全区，此役被八一五派称为‘八二八大捷’。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在这次武斗中动用了非法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并在占领该部队后将军用电台（报话机）15部、军用雨衣和军装一批等军用物资抢回学校武装武斗队。”

其实，抢夺部队物资的何止一个301武斗队！事后我回到宿舍一看，除光溜溜的床板外，室内已经空无一物，这样彻底的洗劫绝不是某一个战斗队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有人说，我们撤出当天，参战的八一五人员以胜利者的姿态收缴“战利品”，为了掩人耳目，有的人竟然在大热天穿上了3、4套军装。以后的几天，又陆续有人闯入校园，肆意劫掠，这就不仅是八一五的人了。

### 在“完蛋就完蛋”广播站

在成都“流亡”了一段时间，中央“九五命令”发布后，各地的两派陆续停止武斗，上交武器。“红联”决定我们返回重庆并继续开展工作。

1967年10月，我被派到反到底设在市中心解放碑旁边民族路上的友谊商店大楼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做观察员，当时还有两位302部队（机要学校）的学员也派驻在此。

这个广播站颇有些名气，原来设在解放碑另一边邹容路上的交电大楼，因为其舆论效果好，很受市民欢迎，被八一五视为眼中钉。8月11日，他们组织武力攻打交电大楼，13日晨，他们的火力将大楼内的易燃物引燃，把整个交电大楼烧成了空架子，广播站才不得不撤离，后来搬迁到了友谊商店楼上。

在友谊商店楼上可以看到不远的解放碑，这是重庆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渝中区民权路、民族路和邹容路交汇处，这座塔楼式的碑体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市政府决定将其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写碑名。

我被派往“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工作后，就住在友谊商店楼上，天天能见到这座雄伟的八角形建筑。那个时候，解放碑地区是繁华的商业区，重庆最大的百货公司（原为著名的三八百货商店）也落户在解放碑的另一侧。不过，当时解放碑周边的大楼都控制在27米以内，所以解放碑仍显得鹤立鸡群，傲然矗立在山



城中心，见证着重庆文革时期的血雨腥风。

“完蛋就完蛋”，这是林彪在文革前一次讲话里说的一句话：“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反到底将这句狠话用作广播站的名字，也足见当时形势之恶劣程度和命名者的良苦用心。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每天早中晚各有一次播音，其中尤以晚7点开始的播音最有影响力。每天傍晚，只要“东方红”乐曲响起，附近的市民就会蜂拥而来，有的带上小板凳，有的带上一张报纸或传单，坐在友谊商店楼前，有的就摩肩接踵站在马路上，聆听这段播音。我有时也站在窗口往下瞧瞧，只见黑压压的一片，足有几百号人，可谓盛况空前，蔚为壮观。

这个效果得益于广播站的主播——著名播音员石友忠。

石友忠能说会道，特别是在攻击八一五派时嬉笑怒骂、幽默挖苦，大量运用方言俚语，通俗易懂，因此很受市民（当然主要是反到底观点的）欢迎。当时播音都不报姓名，不知怎么就被人误传了一个名字“谢掰掰”，因重庆话说脚跛为“掰”，所以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个跛子。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石友忠白天或到处转悠看街头大字报，或看点小报传单，找一点素材，凭着这些素材，他能很快抓住人们关心的话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抑扬顿挫，恰到好处，活脱脱一个评书高手。

（下图：重庆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部分工作人员1967年11月7日合影。现能记得起姓名的有：后排左1程锋，右2文泽云，三排左1石友中〔即“谢掰掰”〕，左3王民新，前排右起1至4为刘明珊、江义玲、卢小林、梁多勤，二排右1为本文作者。）



广播站的开始语和结束语的普通话男播音员叫王民新，人称“王眼镜”；女播音员叫刘明珊，声音很甜。我曾看到过一部章回体文革网络小说，是住在解放碑的一个叫陈珂的当年才12岁的小男孩后来写的，他说：“那个完蛋就

完蛋女子的声音里一点都没有完蛋就完蛋的感觉，性感得很……那声音在嘉陵江两岸回荡。广播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声音的感觉却一直留存下来。”

11月7日，我奉命撤离广播站，全体人员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留着，它时时让我想起在重庆的日子，想起那些天真无邪的中学生，想起和

他们的一段有些悲壮的对话。

“重庆的武斗这么严重，你们怕吗？”我问。

“怕啥子哦！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嘛。”有人脱口而出。

“完蛋就完蛋，死了拉倒。”另一人切中站名，说得很干脆。

“我死了，无非是妈妈大哭一场啰。”一个女孩子轻松地说，显得很天真，她就是刘明姗，我一直记得她。

这些孩子说得很坦然，并非表什么决心，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话。他们并没有认真去考虑过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凭着一腔热血支撑着，确实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重庆武斗中冲锋陷阵的几乎都是这样一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青年工人，死得最多的也是他们，前面所说的望江厂那个单打独斗的孩子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一员。

“红联”交给我的具体任务就是观察动态，了解情况，每周回校汇报。周末，分派到各地的观察员都回到学校，向“红联”头头汇报在各地了解到的情况。

我与这些孩子交往不到一个月。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并一直惦记着他们。不成想互联网时代给了我这个机会，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合影帮我搭上了桥。几年前，我在重庆一个关于文革的博客里贴上那张照片，期望有人看到它帮我找到照片上的某个人。2014年5月，我的QQ收到一个叫赵晓铃的女士来信，她认识刘明姗，并给了我联系电话。于是我立即与明姗通话，并通过她联系到了当年在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工作过的江义玲、程锋、梁多勤等人。时隔47年，能与这些老朋友联系上，也是奇事一桩啊！有机会一定要去会会他们。

## 回乡逃避武斗

离开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回校，重庆武斗仍没有收敛的迹象，直到1967年12月13日又在我们学校发生了一场武斗，双方互伤数十人，虽说比起“八二八”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混乱的局面还很难收拾。大部分学员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纷纷开溜逃避现实，我也借机回到萍乡，在家里难得陪父亲过了一次春节。

我还特地带了100枚毛主席像章，分发给乡亲们。那个时候，毛主席像章可是最吃香的小礼品呀！大家听说我有毛主席像章，大点的人便打着来看看我的旗号索取，小孩子则伸出双手直接抢夺。不出半天，就一扫而光。

农民总是很现实的，作田吃饭、种地还粮，他们遵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潜心经营自家那一亩三分地，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所以家乡显得很平静。

这段时间，一个姑娘进入了我的活动圈子。她和我是近邻，小时候天天见面，却很少在一起玩。她的父亲很传统，对女孩子管得很严，轻易不让她们跟着其他孩子在外面疯，所以还算不上青梅竹马，只是知根知底、两小无猜罢了。她那时在萍乡读高中，也是因文革动乱回家避风，我们俩便有较多的时间在一起聊一聊，慢慢地进入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一年多后，基于她的个人前途考虑，我们终止了进一步的交往，保持了普通朋友的关系。后来，她的母亲和姐姐曾多次向我说明情况，表达歉意。其实这件事本来就没有挑明，何况缘分又岂能勉强得来。所以我很坦然，也照旧与她的家人像从前一样来往，老邻舍嘛。直到如今，我与她们姐妹仍如同亲兄妹，她们四姊妹更是事事支持我。石甲坊建学校、写《村志》，她们都慷慨解囊，说是看我的面子，但我知道，其骨子里还是对家乡的热爱呀！

### 没有正常读书的“毕业”

1968年10月15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曾经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如日中天的群众组织一日之间土崩瓦解，退出政治舞台，死亡数千人，伤万余人的历时近两年的血腥武斗终于止步了。

我们学校“红联”也宣布解散，通知学员回校毕业分配。我是10月20日回到学校的，此时很多学员都已经办好手续离校了，我因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而受到“重视”，和三队谢宝林、四队陈友发、六队孙献等几个人被留下来交代问题。指导员余广达后来把查抄的我的日记本归还给我时，说了一句心里话：我们虽说是非法看了你的全部日记，但也看出了你是一位衷心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好同志，所以也请你原谅。

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此后，我就心有余悸，终止了写日记。转业回地方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开始记流水账，那已经与日记的概念完全不同了。

指导员和很多干部一样，没有参加派别组织，只能算是“逍遥派”，“八二八”事件“红联”被赶走后，这些人在原校领导的组织下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主持重庆支左工作的驻军是支持八一五派的，所以这些干部大多也就是八一五观点。后来总参通信兵部通知学校结束文革，允许全体学员提干毕业，送走了学员，原班子就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1968年11月26日，我终于办完了各项手续，作为一名“军官”离校了。个人档案是自带的，但档案里面是怎么样评价的我却不得而知，指导员没有将鉴定拿给我看，也没有透露一丝口风，应该说这是一份“黑材料”。当时，文革最大的特色就是整“黑材料”，这种情况到底还是在我的身上再一次得到实践。我

自然无意抗争，在这个派性还没有消除的地方，我也无法抗争。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他们至少还认为我是正派可靠的，否则这份档案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自己带回去。想到这里，我算是稍稍得到了一丝安慰，反对派能如此看我，受点委屈也值了。

12月初，我回到82师报到，被暂时安排在师招待所待命。其间，我去老连队架设连走了走，那里已经走马换将、物是人非了；五班也几乎没有了熟悉的面孔，萍乡老乡更是走得差不多了。当时，部队好像也在搞“斗批改”教育，为了避嫌，我不敢久留，以后也没有再去打扰我的老连队，我的老五班。

不久，师干部科通知我，组织上决定让我转业回地方工作。到作训科和腊中老同学欧阳志发聊了聊，他觉得转业也好，部队毕竟不是可以长期呆下去的，晚回去不如早回去，趁年青回地方也好安排，还有足够时间奋斗一番。他还特地买了一个旅行包送给我，祝愿我回地方干出成绩来。

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着一个问题：刚刚提干，还没有实职就转业，这算怎么一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我呢？思前想后，怎么样也睡不着，爬起来就提笔疾书，写了一封长信给干部科。由于心情激动，思绪万千，因此话似流水，文如泉涌，一篇数千字的类似申诉的书稿第二天就摆在了干部科长的办公桌上。

我简要地叙述了重庆文革斗争的基本情况，如实的汇报了本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也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承认对立派未经我阅看作出的所谓鉴定。希望部队领导结合我在架设连的表现给我以公正的评价，并允许我继续留在部队服务。

这篇文笔不俗、言辞恳切、论据无懈、丹心可鉴的申辩书应该打动了有关领导。几天后，干部科通知我，暂时去潭边农场大学生连锻炼一段时间，待日后分配。

这个结果虽不圆满，也还能接受。把我当做“知识分子”去接受劳动改造也算是抬高了我的学历身份，只是原来的“兵头”、现在的“官尾”，要到部队农场去接受“兵”的再教育，听起来有点滑稽而已。

2016年4月15日修订

---

## 【冤狱残片】

###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以史料为准的修订版）

徐小棣

从 2007 年开始，我对关于北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做过一些资料收集和采访。随着时间流逝，我的记忆力和管理资料的能力下降，电脑技术也正在落伍。我想到，应该抓紧时间把我已经收集到的材料做些整理和说明，并找到安放之处。我希望将来官方档案公开时，民间能多这一份此案的佐证。

### 闻佳亲属对案情的梗概叙述

说明：此节选自 2007 年 3 月的采访笔记。此笔记是对 2007 年 9 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实验中学）90 年校庆校史征文的投稿《为无告的闻佳》（落选未刊）中的一段。全文经受访者闻林先生（闻佳的舅父）逐字修改并授权。

闻佳，女，1950 年出生。籍贯四川巴县（今属重庆）。1963 年从北京石油部小学考入北师大女附中。1966 年文革开始。1968 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讨论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同年冬天，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邮电医院救治。家属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时，受到校革委会成员方学邦、丁玉英的阻止，称自杀问题还要追究，遂未能将她接回家。她被从医院直接押回校园，继续监禁在教室（校园监狱）里。此后，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她于 1968 年底或 1969 年初被校方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

1970 年 3 月 5 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十一年里，家人与她音讯两绝。

1979 年 1 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寄达。同年 5 月 21 日，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闻佳接出。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形如纸人，瘦弱枯槁，惨不忍睹。

闻佳出狱后次日，闻林带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就诊，此时看见了 1969 年的初诊病历，从而得知：1969 年 4 月 23 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支队警员李荣兰曾押送她到安定医院就诊，并有“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病历编号是：83872。

经过长期交涉，1987 年 8 月，闻佳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4000 元。2002 年开始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发放，随物价上涨有所增加，到 2007 年接受采访之时每月有 400 多元。

目前，闻佳在重庆，与她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终年服用精神病药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医保。

闻佳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关于判决书上讲的“闻佳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也不成立。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闻佳的父亲的案子也是冤案，

也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

闻佳深陷死亡边缘，但没有死，成了精神残疾。

### 文革当局对闻佳案情的叙述

在 1970 年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委员会发布的《通知》中，公布了顾文选等 47 人的“罪行”提供“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被列入这种《通知》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被处以极刑。闻佳在这份通知中名列第 39，所谓“罪行”如下：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闻佳思想极为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 闻佳无罪释放时亲属收到的文件

1970 年闻佳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后，在亲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关押在邢台监狱。1979 年 1 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写信给闻佳的母亲闻光裕，告知闻佳将“无罪释放”。这是从 1968 年闻佳被师大女附中校园监狱关押并送入北京西城区拘留所后亲属第一次得到闻佳的消息。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公函包括一封信和一份再审判决书，内容如下：

闻光裕：

闻佳原定反革命案现已经我院再审完结，以一九七八年度再字第二十号判决宣告闻佳无罪释放。经查闻佳现无亲属在京居住，又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需有亲属照顾，故与你协商是将闻佳送你处居住，还是做其它安置，请速来函告之。

一九七九年一月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因现行反革命罪于一九七〇年三月

五案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现经审查查明，被告闻佳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告闻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在学校一个废弃的厕所里绝食自尽，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主动交代曾有反革命言行，但未扩散，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原判对被告按现行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兹依法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70）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 闻佳再审判决书的修改稿和定稿

闻佳亲属对1978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未能接受，曾经交涉做了两次修改。第二次修改的这份《再审判决书》是闻佳亲属接受的定稿。笔者问：为什么如此斟酌词句？闻林回答：“很怕修改不好，将来时局再变留下后患。”下文中亲属注重的两个基本事实得到了法院的确认，即：闻佳是由于自己和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反革命罪定罪所依据的是她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原系北京实验中学学生。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刑字第十号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此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委员会（70）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闻佳在北京安定医院的病历

此病历由闻林先生靠记忆提供编号，笔者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北京安定医院查到并获准复印，下文是病历中初诊、复诊的部分摘要：

编号：83872

姓名：闻佳

年龄： 19

婚否：未

初诊日期：1969.4.23

工作单位：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

住址：同上

联系人：李荣兰

联系电话：（44）1290

####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病史：公安局劳改支队李同志介绍情况

该人是劳改学员，现参加学习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压（押）。其父被镇压，其母改嫁，嫁给坏分子，社会关系极坏。

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毁坏像章，写反动标语，说反动话，自杀三次。喝敌敌畏，拒食，喝麻醉药。在学习班仍然放毒，每天发本，乱写反动话，写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发现最高指示被撕，她诬赖是公安人员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个多月，有时冷笑，有时发呆。该人极坏，人家学习，她闹，睡觉。人家睡觉，她乱喊。口称：西城分局班该解散了。进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

人。

现继续散毒。在本上划（画）古代人，划（画）发型，写电影，稀奇古怪。

检查：五官（一） 心肺（一）



精神状态：神清，言谈流畅，对答切题，有明显的联想障碍，如：诉根据政治形势，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现在的父母，而父亲是杨虎成，杨虎成是红岩小说里的黄××。因为自己长得像他，他虽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伙，而是公安人员，其理由是：她看见自己和同伙的脸面都不像是撕的样子，那么肯定是公安人员撕了。用来考验她们，看她们忠不忠于毛主席。

患者自感脑子乱，看见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故在检查本子（公安人员发的本子）上乱写，都写出来，才能进行批判。

患者叙述时，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证明，目前神经不正常（医生签名略）

（另一医生笔迹）

病人认为杨虎成是她父亲，自己不是闻家人。

诊断意见同前：精神分裂症。（注：原病历上“精神分裂症”有下划线强调，医生签名字迹潦草难辨）

复诊：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父（注：指舅父闻林）伴

于五月份宣告无罪，并建议来我门诊医疗。由西城区人民法院盖章。

神清，表情淡漠，问所非答，称“有蛔虫”，神经不清楚，说话声极小，几乎听不清。

（英文药物处方及医生签名略）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舅父伴诊

今日来查 TTT、GPT、胸透。并持西城区人民法院释放证明一份。

透视结果：右肺浸润性肺结核，部分硬结。

（英文药物处方及医生签名略）

## 闻佳的同学的有关回忆

陶洛诵（原师大女附中学生）在《留在世界的尽头》（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3）一书中的叙述：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琬（陶洛诵的化名）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审陶洛诵时）

警员“鲁智深”说：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

鲍国芳（原师大女附中学生），近年曾采访闻林先生，2008年在博客文章《我的同学闻佳》中写下了闻林对她的讲述：

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不知有几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给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

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走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为了让我送卫生纸与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被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十八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

西城区法院的一个庭长叫苗清仲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我从他那里得知了闻佳一些情况。原来开始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



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我们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无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上图：北京四中校园“1970年一次批斗会，中间挂牌者赵京兴，亲历者回忆左边挂牌者是女附中学生闻佳，右边站立者刘平黎。”（《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香港））

许容（原师大女附中学生）2008 年在博客中的叙述：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七二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曾恬，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厂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二十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右图：1968 年闻佳（前一排左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正门前与同班同学的合影。采集于搜狐博客。）



贾群芳（原师大女附中学生）2007 年 11 月 19 日博客文章《闻佳，我心中永远的痛》全文：

18 号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到母亲家看望，给她带些蔬菜水果，告诉她明天我就不来了，因中学同学聚会。这时，坐在一旁的我弟弟搭了一句茬，说你的中学同学我只记得两个，刚要说是哪两个，老妈又说别把我们的话岔开了（她耳背），我心说准是牛立和李卫了，没错，和她俩接触是最多的。过了一会儿，弟弟接着刚才的话茬说：“我只记得牛立和闻佳。”

什么？闻佳？回答的结果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弟弟接着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闻佳是在 0 号楼旁，她可能正要走遇到了我，摸着我的头说，你快快长大吧。后来就听说她被抓起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我弟弟那时大约 10 岁，我家住 1 号楼，0 楼就在我家旁边。我的弟弟，现在已是 50 来岁的人，居然能回忆起 10 岁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对那些细节都记

记忆犹新，真是记忆力超常！其实，弟弟就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闻佳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接着，我又大概说了说闻佳的现状，我们感叹，那场运动毁了多少人，多少家庭！从始至终，我的鼻子都是酸酸的。到了楼下，当我骑上车在返家途中，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弄湿了我的镜片，在寒风中凝结成几片雾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的眼前浮现出梳着两个小辫的脸略显苍白的闻佳，她那时和我的接触也许是比较多的，到我家也来过几次。我记得她总是很佩服朱新，说她当班委认真负责，又是团员，而我俩都不是。我们要向她学习，多做好事，关心集体，向着团员的目标迈进。还有一件小事记忆犹新，她经常拿着我写的字欣赏揣摩，说多好多好，我说我的字才不算好呢，我是受了波儿的影响才写成这样。初一时我和波儿曾是同桌，当我还写方块字时，波儿的字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同桌，就潜移默化地受了熏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方块字改成了“大人字”。闻佳对许多事都是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从争取入团到练习写字，总是不甘落后，不满足于现状，要进步，要当“好人”，是她学生时期始终的信念。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单纯善良的小姑娘，竟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成为“现行反革命”，因不堪忍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曾经到厕所“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后，又听说北京开了闻佳的批斗大会，那时她已经“升格”为政治犯。我早就去插队了，后来的事都是听说的，直到现在，要不是老鲍提供信息，说她在四川老家与老母亲一起生活，神经已经不太正常，对她的事我还是一无所知。我自责，连我的弟弟，当时年仅 10 岁的孩子都能记得最后一次与闻佳见面的情景，我怎么就不记得最后一次见闻佳是哪年哪月呢？我无奈，在那个年代，别说是一个小小中学生了，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各界知名人士都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谁能拯救他们？谁能保护他们？

岁月流逝，如今我们已是一帮“退休老太太”，安享着国家的退休待遇，安闲地“过日子”（鲍语）。命运之神将少年时代的玩伴变为天各一方，命运之神把我们这一代的人生轨迹展现在不同的方向。闻佳，我心中永远的痛，不能想象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个天真烂漫、善良单纯的小姑娘，你无忧无虑的影像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永不磨灭。

王友琴（原师大女附中学生）2007 年 2 月 12 日写给闻佳的信，笔者于同年 3 月已经将打印件面交闻林先生。全文：

闻佳：

您好。

很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但是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很久了。今天才终于得到了您的地址，可以写这封信。

您不知道我，可是我知道您很久很久了。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学生。因为是多次跳班以后进入女附中的，我就被斥为“白专学生”，加上我的父母（都是教员）受到迫害，所以我的1966-1968年都是非常压抑的。但是，在听到了您的遭遇后，我才清楚意识到文革迫害人有多深，有多恐怖。

那是在1968年年底，或者是1969年年初（我的日记都已经失落，不记得是什么时间，只记得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想您能记得），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后来又听我的语文老师余钟惠讲了您的遭遇。

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我问：拘留所在哪里？在学校宿舍的五楼上，有一个同学指给我看了那个地方。

两年以后，我那时候已经去了农村，第一次回家，我妈妈说，她看到了判决书，有个叫闻佳的人，是师大女附中的，被判刑18年。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所了解的那些之后，还有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我渐渐开始严肃地想一个问题：我不能阻挡这样不公正的事情，但是，至少我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写下来。我开始做。

1981年，我去女附中，可是没有人了解您在哪里。1986年，我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卞仲耘校长怎么被红卫兵打死。1993年，我去女附中，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1979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但是您被捕前是中学生。如果是大学生，学校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不管了。她承认没有为您做什么。

没有人知道您在哪里。1996年，我看到陶洛诵的书《写在世界的尽头》。她也是女附中的学生，高二的，从1970到1972，在西城区拘留所被关了两年多。她写到在那里见到您。1997年，我找到了一份材料，是北京公安局在1970年发出的要人们讨论如何处置55个人的材料，其中有您。这份材料的第一个名字是顾文选，他被判处死刑。我在写顾文选的文章中写到了您。

多年来，我一直在作关于文革历史特别是受难者的寻访和记载。我出版了一本书和发表了一些文章，也作了一个网站。

我在文革后从云南考进了北京大学，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陶洛诵现在在澳大利亚。她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很努力地写作。前年，她和我在电话上谈起您的遭遇，我们都说我们应该设法找到您。现在，终于，在北京的朋友徐小棣找到了您的地址。

小棣和我们是一代人，一个有深刻同情心、善意和理解力的人。她家住得离您不远。我希望您能跟她谈话。如果方便，请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我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祝好

王友琴

2007年2月12日

### 闻佳目前的情况

2016年2月17日，我又接到了闻林先生的电话，他已经91岁。他告诉我他已经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住处搬到房山琉璃河居住。两天后，我去琉璃河他的新住处看望了他。

闻林先生又谈到了闻佳。她仍然在重庆居住，她98岁高龄的妈妈仍然健在，闻佳也已经65岁。

闻佳自2002年取得的经济补助目前仍由北京民政部门发放。我见到了两个时间为2015年至2016年2月打款的银行存折。一张存折是闻佳的低保费，每月958元；另一张存折有两个款项，“福养”栏每月357.5元，“央补”栏每月27.5元。闻佳的受助身份需要每半年核实一次，由闻林报请万寿寺街道居委会盖章。

91岁的闻林先生已经感到身体和精力都不足以支付这份操劳，他希望将闻佳的户口连带补助迁往重庆。但因北京、重庆两地发放补助的政策和标准不同，目前无法办理重庆户口准迁并将补助转到重庆发放。北京民政部门提出，可将闻佳接回北京送入收容所。但闻佳的所有亲属对此都持坚决拒绝的态度。

91岁的闻林先生对闻佳的将来忧心如焚。听其叙述，心如刀绞，相对无言。

2016, 3, 11

---

### 【忆旧思亲】

## 无尽的思念

### ——为文革中罹难的父母

蔡天一

父亲蔡启渊（1909~1968），黄埔军校八期毕业，曾任职黄埔军校教育处工兵科上校筑城教官。1968年5月25日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被批斗中遇难。



母亲邱淑佩（1917～1967），成都树德中学毕业，曾任职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1959年辞职回家成为街道居民。1967年7月8日因不堪批斗迫害在成都自杀身亡。

思念，属于从前  
每当清明时节  
去野草丛生的坟头  
悄然无声地  
把晶莹的泪珠点燃  
.....

小弟从老家四川寄来信及照片，信中说他和弟媳于清明日驾摩托车去贾家场上坟，特寄



来照片以疗我故土之思。照片上依旧是那座令人魂绕梦牵的，葬着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照片的合葬坟。坟头上野草青青，坟四周桃李争艳，坟当面墓碑上的字迹十分清晰，看得出那是1983年清明日立的……许多的往事立即涌上心头。（左图：蔡启渊、邱淑佩夫妇遗像。）

1968年上半年，四川的武斗逐步升级，到下半年已惨不忍睹。记得当年有“八月红花遍地开”的说法，用以形容武斗造成血流遍地的惨烈场面。那时，我在“开气找油”的“石油大会战”队伍中，地处威远县的一条小山沟里做临时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闲来无事，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去观看生产队的小煤窑和守窑人的三角形窝棚，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

一日，忽然接到沙君的电报，要我火速赶到成都去处理好友孙从轩君的丧事。我有些茫然，赶回成都后才知道孙君是迫于生活，蹬平板三轮车载人路过四川医学院（华西大学）门口时，被“保卫毛主席”的两派红卫兵相互交火时射杀。

由于孙君家中只有卧于病榻的老母，我们只好瞒着老母，通过成都警司，在殡仪馆的停尸房内找到了孙君的遗体。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变形。我们请人把孙君遗体上的血污清洗干净，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匆匆运到火葬场火化了。记得当时选了一个刻有荷花的骨灰盒，正中嵌上孙君昔年的小照，如花的年岁，过往的一切就这样轻易地装进去了。

料理好孙君的后事，我赶回家中。听大妹讲，父亲已经三个月没有音讯了。弟妹们在5月份照例收到父亲从山西寄来的45元汇单，但过了几天又收到父亲寄来的一张8元汇单，汇单上无任何留言，从此就音信杳无。



弟妹们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危又茫然不知所措，这两月的生活费都是向姨妈和姑姑借的。我想，父亲每月工资不过五十余元，平常每月总是汇回 45 元，留下十来元生活费，手中并无积蓄。而 5 月汇回 45 元后又汇 8 元，这不是连生活费也汇出了吗？

联想到母亲因生活艰辛不堪批斗于去年投井自杀的情况，我感到那张 8 元的汇单是不祥之兆，也许就是一种暗示。

但又想，去年母亲自杀后，我和父亲分别赶回成都时，母亲的遗体已经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场。我同父亲一起步行到琉璃场火葬场去的路上，我曾请求父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自杀，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何况四个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学生，尚无自理生活的能力。父亲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个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杀”。

左思右想，我得不到结论。只好同弟妹们一起去找姨妈和姑姑商议。谁知姨妈和姑姑都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分别拿出一封内容相同的父亲的亲笔信给我看。

信中讲：“这里有人从山东带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说此次运动是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要清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云云，因此，张村小学的造反派组织对我进行了批斗。我虽曾在国民党成都军校任过上校筑城教官，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从未有过渔肉乡民的行为，历史是清楚的；故每次运动都能改造过关，希望这次也能如此。但是这次打得很凶，所以一旦遭遇不测，请代为照料年幼的儿女……”。

读信后我立即提笔给张村小学负责人写去一信，请他们告知我父亲的情况，以便作子女的好向所在单位的领导交待，并说如果父亲已经去世，请帮忙寄回遗物。不久后我们收到从山西寄来的信及包裹，信中说父亲系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已经服安眠药自绝于人民。包裹里除了四卷毛选外，还有几件破旧的衣服，其中棉衣裤上满是血污，联想到“打得很凶”和父亲绝不会自杀的诺言，使我对来信中所说的服安眠药自杀产生了疑问。

父亲于 1909 年出生于成都小淖坝巷。小时候家里很穷，无力供父亲继续读书。父亲遂步行到重庆，经乡亲资助才辗转南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任教于武汉军校，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董必武先生，表达过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支持。

1947 年，父亲因厌恶不正常的政治争斗而从成都军校退伍。后来为生活计，父亲曾学过中医，也曾推过鸡公车游弋于街头巷尾，叫卖过小百货。1951 年，父亲的一位共产党高官同学要父亲去北京某军校任教，父亲拒绝了，理由是不愿再当军人。

1952 年，父亲被山西省招聘团招聘赴山西任教；开始在太原市教高中，后来调到临汾地区教初中，再后来就到了张村小学；虽然父亲从未提起过其中的缘故，但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

1963 年，我因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失去升学机会时，父亲利用假期返蓉的机会带我到斧头巷姓方的中医家拜师。父亲说一技可以养家，一言可以灭族，要我少读点文学作品，多帮助困难的家庭。

父亲又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生活的接力棒仍然交不出去，要我一旦到了法定年龄就和当时的一位女友完婚。我不以为然，心想父亲不是能背诵千余首古诗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么？于是，我天天去泡省图书馆，整日编织着自己年轻又渺茫的文学梦。

1978年，我先后发出几十封信，要求对父亲的死因重新调查。1982年，山西方面终于来人。专案组的结论是：父亲是在批斗会上被踢破下身致死的；自杀的现场是伪造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问题，是父亲在“向党交心”时写了三首诗，当时认为是反党的。

我们要求追回父亲的遗骸，来人捧出一个用红绸裹着的骨灰盒，盒里只装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说当时是软埋的，由于无任何标志，事隔多年现已无法找到软埋的地址。

父亲的下半生欲避开残酷无益的政治争斗，然而，无情的斗争并没有放过父亲。

如今，我举家移居美国，留下那座坟，在故乡的龙泉山上。

清清的山涧幽幽的树，

一代代走向这不归路。

生与死的界线就在这里。祖父来祭曾祖，父亲来祭祖父和曾祖，我来祭父母亲和祖宗……

每年都在桃红李白、鹃泣春暮的时节来登这龙泉山。有时还下着雨，点点滴滴象泪似的雨，点染了苍翠而雾蒙蒙的山，舒缓了无声的寂寞。连山风也来助兴，阵阵细语般的林涛，像父辈的召唤，掠过这山路又不肯消逝，一波一波地掀动我的思绪。湿了的黄泥，沾上了鞋，沾上了心。拖累了我的脚步，却拖不住我年年靠近祖坟的距离。不知何故，已多年未闻鹃声。那一声声缠绵凄迷，闻之令人黯然神伤的哀鸣去了哪里？这怕比“杜鹃啼落桃花月”更为悲凉！唯有路旁的野草野花和涧底的蝌蚪是可爱的，它们躁动着生的乐趣，在这登向祖坟的山路上。

可是，也有过迷失的年代，那是六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我们太小，父亲未来得及带我们走这山路。六十年代走得太快，匆匆地把父辈丢进死亡，却没有丢进祖坟。我们因此迷失过，好在祖坟坐落在山中，没有被掘去。后来，我表弟去山中宣讲“批林批孔”，无意间找到了祖坟。但那时这山路无法走，只有等待。

能走这山路时，母亲的骨灰已在我家的破黑皮箱里躺了十多年。姨妈多次劝我，把母亲的骨灰撒进锦江中，也算中国人的入土为安。但我不肯，我一直等着迎回父亲的遗骸。又谁知那个年代，屈死的人除了不能收尸，甚至不必通知家属。

等了十多年，总算等到稍近人道的年代，父亲的遗骸却不知所终。给我们的骨灰盒里只有一张父亲五十年代的照片，使我们欲哭无泪。这已淡去的哀思何能挥去？

就是这样，我们仍沿着这山路，在祖坟中添下一座，葬着父亲的照片和母亲的骨灰的合葬坟。

不必叙述山民的遭遇。一百五十多年来，他们都守着朴实，守着对祖坟的承诺，守着贫穷和悲哀。即使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在那残酷超过中世纪宗教迫害的年代，我家的迷失，并未影响他们对祖坟的照料。但到了物欲横流的时候，他们对祖坟下了手。虽然只掘到累累

白骨，却掘断了彼此的情谊，掘醒了我的梦。

我深知，那建立在贫穷和风水上的承诺不必去追究。我在祖坟某个角落上的定位并不重要，我不能仅仅为厚重的历史和“无后为大”的家族而生存。令人意外的是，漂泊于万里之遥的我，在寂寞的春夜里突闻杜鹃鸣声。这真是“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这销魂般泣血似的，如唤“不如归去”的哀鸣，唤起我淡淡的乡愁。给我一种意外的温存感，使浪迹天涯的游子感到莫大的欣慰。

也许，明年我该再去祖坟。至少该在祖父墓碑的下款上，添上姑姑和妹妹们的名字。因为，作为家族的历史，应该更为健全。或许我还会种上几株树，挖出一条排水沟，再献上一束山花。

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

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他（她）们或死于异族的侵袭，或死于连年不断的内战，或死于彼伏此起的天灾人祸。无论日出日落冬去春来，年年岁岁他（她）们何曾享受过一次祭奠、一缕烟火？比起他（她）们，父母亲算是幸运的。

我更想到，在那块世代播种仇恨，朝朝代代争夺皇冠的土地上，悲剧并没有结束。

思念，属于明天  
虽然明天难以预见  
但每一朵自在的云霓  
每一顶葱绿的树冠  
就能叫暴烈的天体逆转

1998年7月30日  
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

【忆旧思亲】

## 一曲挽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陈宗周

著名的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人们通常都把它当作一首歌颂爱情的抒情歌曲，而在我的心中，却一直把它视为一曲挽歌。因为，我的初中同学刘胜利，曾经很动情地唱过这首歌，我只听他唱过一次，但却终身难忘。每当听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我总会忆起唱这首歌的刘胜利同学。很不幸，他

在文革武斗中意外身亡。

刘胜利和我同学于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即巴蜀中学）初六四级3班，他比我们大一岁。青春期的青少年，大一岁个子就长很多，也成熟很多。我的记忆中，16岁的刘胜利同学，身材高大，胸膛宽阔，浓密乌黑的头发，轮廓鲜明的方脸，一双大眼，眼神桀骜不驯。现在回想，他已经长成一枚帅小伙子，英气逼人。

刘胜利那时的其他情况，我几乎一点都记不得了。他的兴趣是什么？他爱读什么书？他的志向是什么？我估计，其他同学也不一定还记得。但是，我们记得他喜欢一首歌，有一天清晨，班上同学们第一次在歌声中发现了它。

那个时候，中学生每年都要参加一次一周左右的农忙劳动，我们非常喜爱这难得的乡村生活。不过，虽然也是自己背着被盖卷集体步行到郊外，却不是真正住在农民家里，而是住在条件较好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四川省委第二党校等处的学员宿舍中。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几年后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浪潮中，有同学就把即将开始的知青生活也想象成当年学校农忙劳动时那样轻松而浪漫，这种想象自然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了。

而我们在学校农忙劳动时的乡村生活却的确比较浪漫——离开狭小的教室来到广阔的田野，农活儿不重，又是活泼有趣的集体生活，空气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美好记忆。

1963年深秋，农忙劳动中的一天清晨，我们吃完早饭，出发去远处的田地里劳动。白色大雾弥漫，把乡野的一切遮盖得严严实实，房屋、树林、池塘、小山坡，熟悉的景物全都隐身在白茫茫的浓雾里。

突然，天籁一般的歌声穿透迷雾，飘了过来——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

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有同学轻声问：“谁在唱？”有同学轻声回答，“刘胜利。”

然后，队伍里再没有出声，沙沙沙的脚步声也变得更轻，他的歌声更加响亮。浓雾中看不见刘胜利，他在不远处的另一支队伍中。

我们不但用耳朵听到歌声，也用心感受到他忘情歌唱的模样。这首优美、忧伤的爱情歌曲，刘胜利唱得美妙、婉转、动情，歌声长久地在浓雾笼罩的大地飘荡。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拨动我们的心弦……

后来，我也一直在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了无数次，有那么多著名歌唱家演唱过，为什么只有这一次令人感动，终身难忘？

刘胜利歌喉出色，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首歌颂如火青春、爱情、生命的歌曲，深深为年轻人所喜爱和认同，刘胜利和我们都如此。但是，从过去到现在，校园里都提倡学生努力学习，爱情歌曲从来没有大声登场的机会。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政治氛围中，它们更是只能在年轻人心里轻轻吟唱。

而在那天清晨浓雾弥漫广阔乡野的特殊环境里，刘胜利同学身心完全放开，他是在用青春和年轻生命忘情歌唱。

美丽的青春与年轻的生命，还有两者结合出的爱情，都美好，都需要鲜血浇灌。可惜，我的同学刘胜利，他青春的血液过早就流尽，再不能像他所唱的那样去浇灌火红鲜艳的爱情了。

（下图：初中毕业照，后排中间最高者〔“3 班”二字下方〕即刘胜利。）



1964 年初中毕业后，刘胜利考取了重庆电力技工学校。学校所在的黄葛坪地区在文革中武斗激烈，很多青年学生被“文革旗手”的“文攻武卫”口号所煽动，参加了武斗队，刘胜利也不幸卷入。重庆的武斗队，大都以当时刚生产出来的 56 式半自动步枪武装，那是解放军正规部队才配备的精良武器，杀伤力很强。但刘胜利不是死于武斗的战场，而是死于武斗队同学的误杀。那是 1968 年夏，重庆继 1967 年之后爆发了第二场大规模武斗，当时他们已经从学校撤到了反到底派集中的重庆市体育馆驻扎。一个同学与他开玩笑，端起 56 式半自动步枪对准他，以为枪里没有子弹，结果却打响了，而且正中心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共有三段歌词，在 1963 年秋天那个清晨的大雾中，我记得刘胜利完整唱完了这首歌的三段。但是，后来几十年中，我们都只听到歌唱家们唱前两段，只去咏唱花儿的红与鲜。甚至，在好多网络百科的词条中，这首歌也只有两段歌词。难道我的记忆出问题了吗？明明记得那天刘胜利唱了三段呀！

于是找出当年《冰山上的来客》电影重看。记忆没欺骗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共三段。完整唱出三段的，是电影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古兰丹姆，她的歌

声和电影蒙太奇情景，叙述出她的苦难经历。现在歌唱家们不唱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枯黄？为什么这样凋零？

哎——什么人哪什么人哪把它摧残

使它成为友情破灭的象征

这就对了，经典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如果没有第三段，是破碎和残缺的，艺术感染力大打折扣。而有了第三段，歌曲的艺术张力得到升华，既歌颂了花儿一般热烈而纯洁的青春、爱情、生命，也控诉了这一切美好的摧残者，这才是艺术性与思想性完美结合的优秀歌曲，是创作者的原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青春、爱情、年轻生命的赞歌，也是挽歌——当青春、爱情、年轻生命被摧残，花儿一般枯黄凋零时。

对于年仅 21 岁的刘胜利而言，这首歌更为特别：赞歌短暂，挽歌长存。

刘胜利死后，曾经被他所在的群众组织认定为“烈士”，和其他几位武斗死难者一起埋葬在重庆体育馆前的街心花园内，当时还立有“烈士”墓碑。但后来随着造反派很快退出历史舞台，那里的墓碑被推倒，灵柩被移走，同学们至今不知他的去向。再后来，那街心花园里塑起高大的贺龙元帅铜像——当然，元帅也是文革中殉难的烈士。

我们班的魏怡敏等四位女同学，当年得知刘胜利的死讯后，感念同学情谊，曾赶到体育馆，在遗体入土前见到刘胜利最后一面。她们很勇敢，自己掀开了已经盖棺的棺材盖。魏怡敏后来告诉我，没有想象中的血腥，刘胜利闭着眼睛，安详地躺在那里，好像在睡梦中。只是，他不会再醒来。

魏怡敏还告诉我，她看到刘胜利身边放有一本书《暴风骤雨》，是作家周立波描写东北土改的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是刘胜利生前正在阅读的读物。那一代青年，许多人因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梦想着投身于革命的“暴风骤雨”，所以当文革爆发后无不积极投入，却没想到这场“暴风骤雨”是空前的民族灾难。

年轻的生命就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如此逝去。那样火红，那样鲜艳，那样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他原本可能成长为共和国建设中出色的电气技师，也可能成为日后优秀的歌唱家。一切可能都没有了，年轻的生命如鲜花枯黄凋零。

“什么人哪什么人哪把它摧残？……”歌声在向苍天控诉、呼喊。

所以，我一直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看作挽歌，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清晨，永远不会忘记只听刘胜利唱过那一次的这首歌。我觉得，浓雾中天籁一般的歌儿，那是他最后献给了自己的挽歌。

谨以这首歌悼挽文革中夭折的无数鲜活的年轻生命。

---

【忆旧思亲】

## 迟到的追思

——悼关于正

李自茂

早就想写点东西纪念于正兄（1945.8～1967.8），或是缺乏时机，或是没有条件，多是为生计奔波之故，加之慵懒。时光荏苒，转瞬竟是四十年，当年英姿勃发的我辈，今已白发苍颜，再不动笔，存储器官中的痕迹将湮灭殆尽。

于正兄（我当应称其为弟，他虽与我同年，然其比我小半岁）与我从1963年秋入学时就一直在一起，直至1967年孟秋分手，前后四年，交往颇多，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记得当年农九班中有三位大男生进校时均未发育成熟：李用福、王延金和关于正，完全不像高三毕业的学生，和初一、二年级的小孩差不到哪里去，又瘦又小，许是家境贫寒，营养不良所致。噫！此三位同窗今竟先后作古，且有两位（关于正，李用福）的死都直接与文革相关，岂不痛哉！

于正兄生性耿直，又是个热血男儿。从农九一到转汽九二后，有半年时间我和他一直住一个宿舍，先是在二号楼一楼西侧北边靠洗脸室的一个小房间，我与他两人住了约两个月。1964年10月一个晚上快熄灯时分，我们躺在床上忽听到校广播台播出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他与我竟拿起脸盆从窗户跳出去欢呼。我俩兴奋地奔到明斋，汇入到游行的人群中，血脉贲张地喊着、叫着、唱着，在校园里转了大半圈，回宿舍后许久都无睡意，他又与我聊了很久，聊了些什么，已全无记忆，大致是我们那一代人任重而道远，肩上有解放全人类的责任之类的话。那的确是我们那些人当时的真实思想，不是什么高尚，时代使然吧。

这时期汽九二班有两个班长，我是正的，于正兄为副。我那时对集体的事都特别热心，精力也特别充沛，不惜每周花两个小时召开班委会，而他对我的工作也特别支持，我俩还是团支委，在会上不论我提出什么动议，他总是第一个表态支持的，当时就很感念他。回想起来，哪来那么多事？他和我一样犯傻！

大串联开始后，先出去的多数是干部与工农子弟，即红色子弟。那时是分黑、红色的，在这中间的可谓是杂色。到了10月底，学生约有大半串联去了，我想我等杂色弟子也应该出去见见世面，在那战斗组林立的时期，我纠集了几个成员，记得有岳川、尊正、于正和我（似乎还有一两个人，唉，记不得了）。我们决定去东北。去了大连，鞍山、长春、哈尔滨，当然大庆是必然会去的。由于毫无目

标和目的，所以什么事也未干，看看大字报而已，故也就没留下什么记忆。

转眼就到了1967年夏，上面号召结束串联，我们忽然想到我们串联得太少，赶紧出去吧，不然没机会了。我和班上几位决定去新疆，我也问了关于正，希望他跟我一起走，他说他想回南通老家去看看。记得那天我们是一起到的北京站。岂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去新疆可能也是我的提议吧，因为我有两个姐姐当时在新疆。走到兰州听说新疆部队在抓北京的学生，于是转道西宁，想体验一下围着火炉吃西瓜的生活。西宁城墙是土筑的，又小又破，呆了几天无聊，决定去四川，无非是成都重庆两地。到成都后听说重庆打得厉害，已经动了枪炮，我们转道去了绵阳，听说那里有清华分校。我们去后找到了金国华，他已经在绵阳呆了很久。这时听说于正兄与几位原籍南通的同学去南通了，我想也是回家看看的意思。住了两天后想返京，但因广元一带火车不通，于是又住了几天。

突然有一天，学校打电话过来，说是于正兄在南通被流弹击中已去世（事后知道，这一天是8月29日），我们一下子懵了。赶紧想法回去吧。金国华与绵阳军分区曾打过交道，于是我们找到了分区司令，他老兄挺帮忙，答应派一辆卡车送我们到广元，再转乘火车。也就是在这一次我们得以一睹剑门关，颇发了一通“危乎高哉”、“一夫当关”的感慨。在广元上了火车，车到略阳，又走不动了，耽搁了一天。我找到车站调度商量，说了不少好话，那位调度硬是冒着被农民打的风险把停在第一道上运水牛的货车调开，给我们这趟车让开了路。前后折腾了五、六天我们才回到北京。

第二天，9月18日，井冈山兵团在大礼堂召开了于正兄的追悼会，横幅上写着“清华井冈山兵团战士刘庆、关于正烈士永垂不朽”。烈士乎？当然，昨天、今天乃至明天，大概没有人会认同，然在我心目中，于正兄确乎是烈士！《韩非



子》云：好名义不仕进者，世谓之烈士。为了理想（尽管可能是空想），为了信念（信念应无是非吧？），没有惧怕，更无私欲，性情中人，非为己死，非烈士，何以名之？

呜呼，于正，卅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天人相阻，何处话衷肠？

这些文字，鸿爪雪泥，算是我对于正兄迟到的追思。（左图：关于正〔中〕观棋，

左为李自茂，右为李德谦。）



后记：有关关于正遇难的真实原因，张庚最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得于正是在劝阻武斗时被流弹击中的，若属实的话，请自茂斟酌是否在‘回忆’文里补上。”

【补记】有关关于正的死因，现在能找到的只有在邱心伟等编辑的《清华文革亲历》中的一段文字，我将其抄录如下：

清华《井冈山报》（1967年9月18日）上刊登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一文，文中讲：8月28日，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大刀，乌黑黑枪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你向我们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在烟火弥漫的深夜，在被围困的四楼阳台上，你和战友们一起遥望北京城，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我不是南通那场武斗的亲历者，对南通的文革情形更是一无所知，处理羌的后事时我也没去过。羌于正的遇难情形，唯有这段话留下了历史的记载。

（2016年3月补记）

\*本文曾刊于清华校友《汽九2008年纪念册》。

---

【忆旧思亲】

## 半个世纪的思念

罗成胜

2016年4月5日，为查实我的回忆录《我的造反生涯》中一处记述的真实性，已经七十岁的我独自一人骑车前往垫江。在垫江的两天时间里，不但纠正了我的书中那处记述错误，更是勾起了一个人那半个世纪的思念。

他叫王明，已经满意地办完自己一儿一女婚事的他如今已经年过半百。

然而，49年前的1967年，当他的只有25岁的父亲王元发作为红卫兵为当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只有两岁。

他父亲王元发，当年是涪陵地区农业学校（中专）的学生，班干部，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被学校抽出去在农村搞社教运动，由于工作积极负责，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中专学生中为数极少的中共党员。

1966年11月15日，在全国及涪陵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后，“革命造反”风起云涌，王元发理所当然地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并由他组织起四川省涪陵农业校红卫兵中流击水战斗团，然后联合了学校其他造反组织成立了涪陵农校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并担任负责人，后来又被吸收进入“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一般简称“忠实兵司令部”）担任常委，从而成为当年涪陵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领导班子里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由于我1967年4月从监狱出来到5月中央“四川十条”下达都在北京，回涪陵后又全身心投入到“忠实兵”组织的恢复、巩固、发展及应付武斗等工作中，所以我与王元发的私人接触不多；加上他本来就比较低调，但对司令部的决定是坚决执行的，也很支持司令部的工作，特别是他推荐的几个同学进入忠实兵司令部（如冉乾光在忠实兵司令部政治部并曾经被派往成都主持《忠实兵战报》成都版的工作，冉启辉进入忠实兵司令部负责办公室工作等）都干得很出色。（下图：王元发遗像。）



1967年8月，那年最炎热的季节，也是涪陵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日子。“忠实派”因为被当年成都军区颁发的“涪陵五条”指定为“革命群众组织”，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地区支左部队和重庆“反到底派”的支持下，于8月14日用枪炮将同样拥有枪炮的对立派“红卫派”（被成都军区颁发的“涪陵五条”定为“保守组织”）赶出了涪陵城。“忠实派”作为当时拥有政治合法性的“革命群众组织”获得的胜利使组织的所有人员欢欣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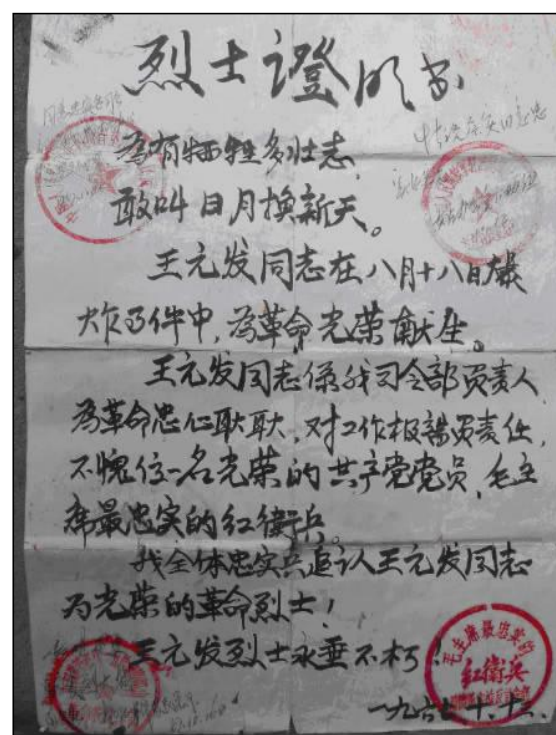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了。

1967年8月18日，上午8点多钟。涪陵地区专员公署3层高的办公大楼（也是当年“忠实派”最主要的据点）在一声巨响中爆炸。大楼中宽度有3间多个房间，从下到上全部炸塌，也就是说，上下9间房被齐刷刷炸飞，夷为平地。爆炸共炸死12人，而王元发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我记忆上的错误，在《我的造反生涯》一书中，唯一谈及这次大爆炸的一处文字里（第87页）竟然将王元发的名字写成了他身亡后接替他的负责人高应华；所以当王明今年2月6日在我的博客里看到我的书的电子文档而给我留言时，我立即感到可能有误，而那次垫江之行，就是专程前往垫江面见王明查实并

纠正错误的。

才读了《我的造反生涯》一书后的万少林先生（退休前的长江师院美术系副教授，当年涪陵一中的“忠实兵”）前几天告诉我：“8月18号专署大楼爆炸的



那天早晨，我刚刚从大楼底层负责保管忠实兵司令部的枪支弹药的王元发那里领了几十发子弹出来，还没有走到专署的大门（离办公大楼不到100米），就听到身后一声巨响——专署大楼爆炸了。”

原来，作为“忠实兵司令部”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王元发在当年自然被安排到一个只有最值得信任的人才能干的最重要的岗位上——负责管理关系重大的枪支弹药。“王元发这个人非常负责，他有专门的登记册，谁领了什么，领了多少，他都有记录。”万少林还给我说。（左图：当年由涪陵“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司令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其中写的是：“我全体忠实兵追认王元发同志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王元发的死，无疑对家居垫江农村、原本就贫困的一家人是极大的打击，而王明的母亲随后改嫁，更使只有两岁的王明从小就失去了父爱和母爱，他只能靠体弱多病的爷爷婆婆抚养。

好在王明自己很争气，吃了不少苦，经历很多磨难，最终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外出打拼的路，并经过在北京、云南、内蒙等地的闯荡后，终于在如今自己供职的行业中闯出一条路；现在他落叶归根，在垫江城里买了房、有了车，儿女幸福，家庭和睦。但他说，他除了痛惜抚养他的爷爷婆婆没能享受到如今的幸福之外，就是思念他那在他只有两岁时就罹难的父亲。（右图：本文作者与王元发之子王明〔右〕合影。）



他拿出他们一家保存了半个世纪的遗物，其中有当年由涪陵忠实兵司令部出具的调查报告（报告后面有当时各级行政机构、支左办公室、垫江县人武部等的批示）、有忠实兵司令部出具的《烈士证明书》；一本他父亲当年的笔记本——笔记本里除了不少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笔记外，还有一个字一个字地工整抄录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如多达 25000 字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我在写书过程中在网上查询很久而不得的 1967 年 3 月 27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等等。

无疑，王元发的死是无辜的；事后涪陵“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都将这次“818 专署大楼爆炸”列为大案要案加以清查但亦终无结果，然而，爆炸物是“忠实派”自己堆放在专署大楼底楼边角房间里的炸药、雷管却是事实。所以现在只能解释为当时人们的无知造成的。

作为文革中千百万失去亲人的家人、后代们——特别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家人、后代们，他们的思念，人们知道吗？了解吗？进一步说，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诉求，人们关心过、过问过吗？

我这个一心还原历史真相的当事人尚且会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我不知道那些有意隐瞒这段悲惨历史、甚至刻意歪曲这段历史的人会对文革中千百万失去亲人的家人、后代们——特别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家人、后代们，带来多大的心理伤害……

愿我的好哥子——王元发在天之灵安息！

---

## 【书海泛舟】

### 记录者的印迹

#### ——《大逃港》作者答客问

陈秉安



问：《大逃港》出版至今已经 6 年多了，许多朋友都很想知道有关此书出版的一些事情。一般认为，《大逃港》是一部“暴露性”的作品，读者都觉得，这部作品当年能够顺利出版很不容易，这背后有不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我们注意到作品的后一部份写到了关于习仲勋的内容。

（左图：《大逃港》作者陈秉安近照。）

答：这是一个误会。《大逃港》的出版没有任何政治的背景，完全是广东人民出版社自己的行为。最先发现稿件的，还不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并且稿子拿去后，都被“审”了下来。广东人民出版社是要稿的第三家了，我曾经坦率地对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卢社长说，这个题材比较敏感，也许会给贵社添麻烦的。出版社因为出书“违规”受到处分的事，已有多例在先了。但是他们决心很大，说，广东的空气还是好的吧，大逃港这件事，在广东民间是家喻户晓的，怎么也回避不过去。今天不出，将来还是会出，即使真的有什么责任被追究，我们也愿承担。我于是很为其胆魄感动，我说，如果有政治责任，我们共同来承担吧。

问：作品是否经过了送审？中间有没有什么曲折？

答：送审了。广东人民出版社把作品交给了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审。的确，那段时间我们都很紧张，快一个月过去了，我都以为审不下去了。谁知道，很快电话就来了，同意出版。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曲折，其时为2010年。

问：出书后的社会反响与你本人的估计一致吗？

答：不很一样。出书之前，根本没有想到《大逃港》会有多大的社会反响，更没企盼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只是想，我是个做记者的作家，历史上既然发生过这么一个事件，就不应该让它沉埋。一种做记者，做作家的良知吧。当时觉得，能出版就很不错了。

问：《大逃港》出版后有些什么反响？

答：比较热烈。最初只是在《羊城晚报》和《深圳特区报》上作了短短的出书报导，谁知道消息一出，竟然引起连锁反响。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刊载了长文《人民只会用脚投票》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深圳、广州、南京、上海、北京的报纸，包括海外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英文版的《南华早报》……数十家境内外的报纸接连作了大篇幅报道。腾讯、凤凰网、搜狐、新浪、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网站纷纷刊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亚洲电视台、香港卫视、凤凰卫视、及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往事》专门作了访谈。香港中和出版公司用繁体面向华人世界出版之后，书籍被广销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台湾、新加坡……很快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问：有海外华人媒体甚至认为，“《大逃港》是近年来，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反映最强烈的中国文学书籍之一。”你认为是这样吗？

答：当然是过誉之辞。我不那样认为。我深知，并非是我的书写得有多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被隐埋的历史真相实在太多，人民群众内心普遍抱有知晓真相的强烈渴望，推动了书籍的传播。

问：目前，国内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逃港》的盗版，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是的，我已经查实了有这回事，我的手边也买到了盗版印刷的《大逃港》，当然十分不悦，我已与有关单位联系，我保留申请法律保护的权利。

问：听说《大逃港》出版后，你结交了一批逃港者朋友，是这样的吗？

答：这是一件很令我高兴的事。《大逃港》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很多的来信来电，得以结交到一批在逃港中九死一生、受尽磨难的亲历者。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一位远在千里外的福建的老者，不辞辛苦，辗转坐车来深圳找我，给我送上他的一本笔记，笔记中详细记载了他的逃港经历。

特别是现居于香港、加拿大、美国的一些当年的逃港者，他们在读过《大逃港》后，自动组织起来，推举美国旧金山的汪伦先生，香港的黄东汉先生，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把他们当年的照片、回忆逃港经历的文章寄给我。有些还给我绘下了当年逃港的路线图。黄东汉先生提供给我的材料竟达数十万字之多！黄东汉本人就是一位不错的作家，可是他说：“我们是你送弹药的，你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提供什么，盼望你的第二卷，能写出真实的我们！”

受人之托，宛若千斤，常使我感觉肩上负担的沉重。

问：《大逃港》披露了一些内部材料，比如说“闸门山事件”。有传言说你曾经被询问过材料的来源，作品同时也受到过一些质疑，是不是有这回事？

答：这应该是虚传，我披露的都是公开档案，有何可追究的呢？中宣部的确曾调书去作再审查，那是真的。至于对作品的质疑倒是有的，我可以说一下。质疑意见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作品对“逃港事件”的评价过高，比如香港学者张穗强先生，就在《知青逃港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逃港是因“粤港两地间特定的历史、地理因素”而形成的。“广州市及珠三角地区几乎家家都有亲友在香港。”“以非法偷渡方式去香港，”“从不认为是什大事情。”值不得大惊小怪，刻意渲染，甚至把它拔高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的高度。”

对此，作品本身已有回答，在此不作多评。

第二是对作品的文学性和纪实性的处理问题，有认为，既然是记录历史，就不应该有太多的文学描写。比如谷子先生就在《真实性是纪实文学的生命》一文中指出过作品的几处“硬伤”，并批评作品，“为了追求现场感和生动性，不惜牺牲真实性、准确性。”

谷子先生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大逃港》所记述的完全是真人真事，但是如何把握“描写”的“度”，不好处理。比如说，逃港者心理活动，你怎么知道？逃港路上的细节，雾气、鸟叫……你怎么知道？但纪实作品，又必须通过这些“描写”来引人入胜。纪实作品与历史教科书还是不同的，就像《三国演义》不同于《三国志》一样。

问：据说，对你非议最多的是有关逃港的规模，即逃港的人数究竟是多少，是不是你说的在一百万以上的问题。

答：是的，这是国内外传媒议论得最多，也是我最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无论大陆和港方，我都没有找到官方对于逃港人数真实的统计数字。我强调的是“真实”。大陆官方档案，某几年的确统计上报过逃港人数，但都是“宁少勿多”（一位宝安县原领导人话）。试想，不管是公社还是大队，谁愿意上报说自己辖下逃港的人数多呢？

香港著名记者周奕先生认为，根据他的计算，1950至1980的30年中，真正在香港定居成为香港公民的人数只有70万（见2012年1月13日香港《明报》），这与我说的“百万以上”有出入。

而我的计算是大逃港的人数至少在120.3万之上：因为1950至1980的30年中，香港增加人口为272.6万，其中通过合法手续来港人数为54万（每天允入港50人）。自然增长为98.3万（平均每年增长1.7%）。

那么： $272.6\text{万}-54\text{万}-98.3\text{万}=120.3\text{万}$ 。

为什么我与周先生的计算有出入？估计周奕先生计算的70万人，只是“真正在香港定居成为香港公民”的人数，他恐未把到港后又转到台湾、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地区的逃港者人数计算在内，这是很大的一个人群组成。更没有把逃港中饿死、摔死，尤其是淹死在海中的逃港者计算在内。这些人加在一起，岂是20万30万可以打住的？

至于还有更多的被遣送回去的逃港者：如果以两个“逃港者”中能有一个成功计算，即使把“多次逃港”考虑在内，周先生所说70万“成功者”身后，也会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未成功者”的组成。所以，我把逃港的人数定在“至少在120万人之上”，把30年的逃港事件



称为“百万大逃港”，显然不是过分之辞。（上图：40多年后，当年的四位逃港者相约在海边合影留念。）

问：写完了《大逃港》后，你在写作上还有什么打算？

答：我在准备写《大逃港》的第二部。出于第一部出版后的一些反馈和许许多多读者的希望，我无法回避这个责任。《大逃港》第二部的内容包括知识青年大逃港和规模最大的一次逃港潮：1979年的“5·6”大逃港。由于有一批亲身

穿越铁丝网，亲身泅渡大鹏湾、深圳湾的朋友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乃至打气，我感觉写起来会更充实、更有真实感，也更令我有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

问：听说香港的逃港者，受到《大逃港》一书的触动，自发地树建了一块“逃港者纪念碑”，真有此事吗？

答：我听说有此事，但不知是否确实，如果有，我相信早晚那里会成为香港的一处景点。